

記憶

REMEMBRANCE



1957年，全党进行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和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但是，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图为中国人民大学反右派辩论大会。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6月30日第8期 总第186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86期

纪念反右运动六十周年专辑（一）

目录

【专稿】

- 刘新华 “猴子被吓住，鸡却没有死”
——我的母亲刘衡 2
- 张比 文革中清华大学原右派分子的境遇 10

【评论】

- 吴美潮 “自由退出”与“言者无罪”
——纪念右派蒙难60周年 24

【读书】

- 钱理群 拒绝遗忘：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读张先痴：《格拉古梦魇》 29

【述往】

- 吴美潮 上海交大的第一张大字报 34

【文摘】

- 林培瑞 “57右派”已成为极高的荣誉 36
- 丁抒 《五十年後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前言 39
- 程映虹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节选）
——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 41

【本刊声明】

【专稿】

“猴子被吓住，鸡却没有死”

——我的母亲刘衡

刘新华

一

1957年我在呼和浩特麻花板幼儿园中班，它属于全托寄宿制。我不习惯这种吃喝拉撒睡都按部就班的集体生活，每周去幼儿园之前总要设法逃避，从假装肚子疼到藏到箱子



里，用尽了一个学龄前儿童能够想到的各种小伎俩。这就是我最大的烦恼，对那个波诡云谲的夏天给全家带来的灾难懵然无知。后来渐渐感觉到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大人常来家里和爸爸妈妈关起门谈话。有时候我还听到爸爸和妈妈大声争论着什么，悄悄看去，爸爸不断地做出各种手势，很凶的样子，妈妈在一旁默默地流着眼泪。我十

（妈妈和我在北海公园，1954或1955年，原为黑白片）分害怕，爸爸妈妈总是教育我们兄妹之间要团结友爱，为什么自己还要吵架？

不久后全家从内蒙古回到北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妈妈是右派，还知道右派是坏人，是反动分子。广播里没完没了地放《社会主义好》，里边一句：“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总让我心惊肉跳。最后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几年前在一个公共场合，当时所有的人都笑了，我却没有觉得可笑，我忘不了它曾给我带来的屈辱。

二

妈妈在唐山劳动改造了三年后回到报社，别人都摘了右派帽子，唯独她加重处分。当时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妈妈就在这个北京最繁华的地方喂猪，每月发26元生活费。

1961年爸爸调到云南工作，随后全家也去了，只有妈妈和我留在北京。在这样的逆境中，妈妈尽管痛苦不堪，但为了不影响孩子，在我面前仍然表现出很乐观的样子。她坚决否认自己是右派，逢人就讲述自己的看法。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一直担任班干部，老师们也很喜欢我，尤其是班主任甘老师，经常请我到她家共同商量班里的事情。在一次家访中甘老师知道了妈妈的情况，从此对我态度大变，处处刁难指责，在期末的操行评语中竟然说我“错误比较严重”。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又有多大的能力犯严重错误呢？我的错误就是我是右派妈妈生的。

我当时还小，并不能完全理解妈妈，对妈妈的感情很矛盾，有时候会产生抱怨，认为她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灾难。我没有抗打击能力，便也于1963年去了云南，半年后又随爸爸去了内蒙，妈妈一个人孤零零地困在北京，进行坚壁清野式的抗争。

三

“阳谋”设计者曾像受了很大委屈一样喊“这是为什么？”我心里也一直有同样的疑问，但是右派已经成为家里禁忌的话题。有一天我看到爸爸心情不错，便小心翼翼地问妈妈为什么当了右派，爸爸看着我慢慢地回答说，因为她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可是妈妈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呢？爸爸沉默了许久，挤出的答案是因为她是右派。

我被这种循环论证绕得似懂非懂。爸爸也知道我并没有被真正说服，一个周末，他从资料室搬来1957年全年的《人民日报》，要我认真看。

我看到了许多著名的右派言论，却没有看出这些言论究竟恶毒在哪里。“党天下”是不好的词吗？为什么很多人都理直气壮地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实际上是在骂共产党吗？政治设计院似乎就是大家共同研究国家大事，有什么不对呢？我当时只是一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这些东西不在我的理解范围，令人困惑。

还有那个葛佩琦，一提起他，除了“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就是“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他说党如果做不好，群众就可以杀共产党。人们当然

可以批评他太悲观了，对党失去信心，也可以说如果党有错误应该帮助党，不要杀头，甚至可以表示如果真有那天，我们自杀，无须别人动手，这些都可以回应葛佩琦，但是怎么能硬说人家要杀共产党呢？这不是语文老师教过的假设句吗？

许多年后知道，类似的话大人物也说过，毛主席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就造反。邓小平在联合国昭告全世界，如果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世界人民就应当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按照这种逻辑，不就成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号召造党中央的反和打倒中国吗？这些话虽算不上杀气腾腾，咬牙切齿的级别还是够的。毛主席说的话大家当然不敢批评，但批邓时邓小平被骂的狗血淋头，连蛮不讲理的四人帮都没有拿这句话做文章，可见这种断章取义的批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当时我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只是难以理解甚至感觉有些不对头，更多的却是深深的恐惧：为什么我会同情这些敌人？为什么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将来也会成为他们那样的阶级敌人吗？

四

和妈妈分开后，爸爸不希望我们几个孩子和妈妈有任何联系。文革中爸爸也被打倒，已经无力反对我们和另一个阶级敌人来往。1968年，年轻学生造反胡闹一番后，像用过的抹布一样被丢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哥哥去插队，一年后我去了建设兵团，都离开了家，爸爸更是鞭长莫及。尤



其是林彪事件发生后，大家对过去的（1962年4月，姥姥、妈妈、我和被打成右派的姥爷）那一套开始反思，政治环境有所松动，我几乎每年都回北京看望妈妈。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文革促使我真正思考，过去不清楚的问题可以直接问妈妈了。妈

妈向我详细讲述了她当右派的经过。说老实话，妈妈这个右派当得有些惭愧，她并没有提出什么思想体系，没有什么“政治设计院”的宏论，也没有对“党天下”有什么批评，她只是对一些具体做法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结果被上纲为攻击肃反，包庇右派父亲和为胡风鸣不平三条罪状。

妈妈说，她没有攻击肃反运动，而是肯定了肃反的成绩，只是认为肃反运动中搞斗争会这种形式不好，伤害了许多自己的同志。她自己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就有过教训，不希望重演以前的闹剧。所谓包庇她父亲的真相是她写信要她父亲实事求是地向党讲明情况，连中央组织部也认为包庇她父亲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三条罪状中最严重的就是为胡风鸣不平，而且被称为矛头指向毛主席。她不明白毛主席说谁是特务谁就是，却傻乎乎地说没发现胡风与国民党有组织上的联系，问中央是否掌握了其它材料。

她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在大鸣大放时期说的，也没有写大字报，而是在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思想时谈的，却被一口咬定为配合右派在党内进攻。

五

妈妈说过去国民党指责共产党故意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我们不承认，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硬是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敌人，他们有什么错？无非就是我们需要阶级敌人，狼对羊说你的错误就是我的肚子饿。反右时那些积极分子处在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的亢奋中，捉得越多越上瘾。当时爸爸的一只脚也踏进了右派的行列，反右领导小组的一个人说了一句，“算了，不要把人家两口子都搞成右派”，于是侥幸逃脱。划右派就像饭馆里点菜一样随意。

按说妈妈根本算不上主菜，只是一小碟配菜或甜点，但是她始终不肯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在报社，刘衡成为顽固不化的同义词。为了惩罚这个不低头罪，妈妈不断地受到越来越严酷的迫害。对一些人们眼里理所当然的东西，妈妈经常质疑。要她在劳动改造中认罪，她说：“劳动和认罪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劳动可以认罪？”组织上允诺只要她承认

自己是右派，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她问：“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是小偷，就可以不算小偷，这是什么逻辑？”当时把改造后的右派按表现从好到坏分为口服心服、口服心不服、心口都不服三类，妈妈问：“口服心不服的人明明是说假话，为什么比说真话的心口都不服改造得好？”

六

妈妈心里是怎么想的，总是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她最不能理解的是这样做反而被指责为不老实，她不停地反问“我哪里不老实？请你们指出来。”

妈妈总是在不停地讲道理，在那些人眼里，她越讲道理，便越是顽固，越是气焰嚣张。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妈妈永远长不了那个一智，只好一堑接一堑不停地吃。从资料室赶到印刷厂，最后进了牛棚，工资也一降再降。后来妈妈给胡耀邦写信，说二十年来我的问题就是那三条，一直没有新的问题，每来一次运动就处罚我一次，没完没了地层层加码，什么时候能有个头？

很多人奇怪妈妈这样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人为什么不了解党内斗争，把自己搞得这样惨，他们都知道秀才遇到丘八是无法讲理的，因此没必要吃眼前亏。

其实妈妈尽管入党几十年，并没有弄明白她认定的理和人家遵循的理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天灵盖，一个是狼牙棒。同样，语言体系也是不同的，妈妈决心要当老实人，不能讲假话，在上级领导的眼里，这是不识时务。在他们的字典里，老实就是听话，就是百依百顺，上级说煤球是白的，你就要颠倒黑白，说地球是方的，你也不能妄议，跟着指鹿为马，才是老实。妈妈总以为不能欺骗组织，其实组织上有时是欢迎欺骗的，他们要的只是服服帖帖，至于真假倒是无所谓的。

七

那个年代领导带头，上行下效，许多人以凌辱知识分子为乐趣。妈妈不仅在精神上受

到各种侮辱，肉体上也备受摧残。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各种花样不断，从批刘少奇到批王关戚，从批孔老二到批宋江，一有风吹草动，妈妈就被拉出来批斗。每次游街都排在第一位，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甚至搞出假活埋闹剧。这些情况她从未向我提起，我是看了妈妈的回忆录和其他人的文章才知道的。妈妈被当做杀鸡吓猴中的那只鸡，她从不屈服，还写诗“……猴子被吓住，鸡却没有死。”

文革中时兴“揪叛徒”，造反派找妈妈外调，要她证明某位地下党同学是叛徒。妈妈向造反派解释党的“隐蔽精干”方针，说明当时允许入狱的革命者写自首出狱是国共合作时期党的一项集体决定，不属于背叛组织，并说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也是不能成立的，并建议来外调的造反派好好读一读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结果被打得手指骨折。

有一次我问妈妈：“既然当时共产党员可以写假自首，你为什么不能写假检查？”妈妈生气地回答：“我们可以欺骗敌人，但是怎么能欺骗组织呢？”我说：“欺骗组织有什么大惊小怪，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还欺骗毛主席呢。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留得青山在，将来拉清单。你只知道传统的道德伦理，不知道革命者还有责任伦理。”妈妈说大人物可以先保存自己，然后反攻倒算，自己是小人物，没有秋后算账的能力，只能当烈士，即使可以回到过去重来一遍，也没有其它选择。

妈妈是死不悔改的顽固右派，而且不是一般的顽固，这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她自我解嘲说，顽固也有好处，报社的许多右派摘帽子后被分配到内蒙、新疆等地，她因为没有摘帽子，没有单位肯接受，只能留在人民日报社，反而得以留在北京。

妈妈像一根湿木头，你想烧一下，只能带来滚滚浓烟，熏得玩火者狼狈不堪。右派改正后的几十年里，形形色色的不叫运动的运动接连不断，无论形势如何险恶，妈妈仍是大声仗义执言，那些整人者知道这根骨头啃不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八

妈妈当右派时受到各种虐待，却从不单纯为自己喊冤叫屈，许多人劝妈妈只谈自己的

冤屈，不要涉及整个反右运动，否则就是否定了反右，麻烦就大了。妈妈回答：“我谈的就是整个反右的问题，只有纠正了反右的错误，我的问题才能够解决。”

妈妈对反右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她起初并没有否定反右，只是认为一些人被错划，因此应该有一个甄别的程序来纠正。文革中我曾对妈妈说，反右恐怕不是个别人搞错了，而是根本上就错了。妈妈当时很吃惊：“你是说反右完全是个错误？”后来妈妈接受了这个观点，晚年对这个问题更是有了很深的反思。

我和妈妈在一些问题上也有过不同的看法。最令妈妈寒心的是弱者之间的互相欺凌，它比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更可怕。在劳改时和在牛棚中，妈妈是贱民中的贱民，有些人为了在妈妈身上挣表现，做出了种种丑陋行为，使妈妈产生了豆在釜中泣的悲愤。妈妈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种灵魂的阴暗，她坚持采用真实姓名，认为这些人做了坏事，应该被历史记录下来。我则认为主要应该揭示那个逼迫人们丧尽天良的政治环境，这些具体的人不过是一些符号，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并不重要。当时我们在争论中互不相让，没想到不久后妈妈离开了我们，这次争论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痛楚。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还是妈妈的道理更多一些，对那些邪恶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只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记录下来，留给历史审判。

九

1978年，妈妈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们都很高兴，认为党终于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前途光明，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太幼稚太乐观了，没想到姗姗来迟的公平和正义只是来这里拐个弯，随即掉头而去。

实际上右派得以改正有很大的偶然性，主要源于胡耀邦的一个自选动作。当时两个凡是受到质疑，四项原则尚未提出，英明领袖作风比较民主，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曾经在反右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那位第一线总指挥还没有成为第二代核心，走资派都在纷纷要求平反，自顾不暇。思想领域、组织领域和社会思潮各方面出现了新气象，胡耀邦、杨士杰等人抓

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力排众议，使右派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搭了顺风车。

胡耀邦的胆识令人极为钦佩，当时为了排除重重阻力，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大家对此都很理解。可是事实证明这个改正是很不彻底的，很快又出现了什么“娘打儿子”之类的言论，妈妈对此极为反感，连呼无耻。最令她无法接受的论调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出现了扩大化”。为了这个歪理，还特意保留了几位右派不予改正，即便如此，也不得不承认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都搞错了。妈妈生气地说：“如果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们说杀人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杀多了，理由是几十万人中总会有几个有问题的人，我们能接受这样的逻辑吗？”

当初整人时歇斯底里，后来改正时却哼哼唧唧，然后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了沙子里。人们没有得到一个像样的交代，反而收到了封口的胶带，许多问题成为言论禁区。妈妈总是叨叨说如果不能接受教训，不肯承认错误，我们这么多年的罪就白受了，这些苦难真的就是毫无意义。恶恐人知，必是大恶，拼命掩盖大恶，说明恶势力还在，还会卷土重来。

十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至今仍有报社的同事们写文章怀念她。她的一生，能够说的，她大声疾呼毫无保留，能够做的，她不计安危竭尽全力。生前尽到了责任，死后捐献了遗体，对这个国家问心无愧，对这个党仁至义尽。

在历次运动中，反右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却是一个转折点。随着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遭到灭顶之灾，理性湮灭走向疯狂。随之而来的是大饥荒、大动乱，农民、干部、学生、工人依次被按在祭坛上，无一幸免。

翻开历史，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经验，全是惨痛的教训。正如黑格尔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前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就是这样在哀之复哀之的死循环中从血腥走向堕落。■

【专稿】

文革中清华大学原右派分子的境遇

张比

前言

去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今年是反右斗争60周年。这两场在中国发生的重要的政治运动，作为特殊的历史现象，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近年来，关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士在文革中的表现以及他们和造反派的关系，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兴趣。2013年12月2日的“爱思想”网站，曾刊登周伦佐《“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一文，认为“右派受到造反派的迫害”一说不妥，而实际情况是右派同情造反派，与造反派在思想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文列举了湖南等地的一些事例。笔者认为右派与造反派的关系比较复杂，不是用“遭受迫害”或“同情”等一句话就可概括。以下就我了解到的文革时期清华大学的情况做一些论述。

文革时期清华大学在校的右派分子（包括摘帽和未摘帽的）大多是教师和职员。关于他们的思想和生存状态，至今记录和回忆的文字不多。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追寻部分教职员中的右派在那个动乱时期的痕迹，探讨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这一特殊群体的命运和精神状态。

依稀记得，1957年整风初期，右派“猖狂进攻时”，作为清华附小6年级学生的我，在二校门附近看到有一张小字报，观者甚众。作者自称“弱者”，抨击了独裁者的专制思想，并怒斥“臭娼蓝苹”，可谓“反动”至极。本文就以“弱者”来借代那些文革中已经很难发出声音的老右派们吧。

一、文革前夕右派们的生态

反右时清华共划右派571人，其中学生349人，教职员222人。划右派和处理右派的工作，从1957年7月开始，到1958年年底基本结束。右派共分为6类。第一类是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极右分子”，是要逮捕法办的，只有学生孙宝琮和教授徐璋本二人。徐璋本教授入狱后，先在北京，后在河北。他入狱后，家庭生活困难，好友钱学森曾从自己的工资里每月拿出几十元给徐的夫人。后来钱受到批评，清华大学工会又每月给徐家一些生活补助，钱才不再补贴徐家，并做了检讨，加入了中共。

周恩来表示，徐如承认错误，可不判刑，回清华教书，但徐拒不认罪，慨然入狱。原党委书记袁永熙在劳动一段时间后，被下放到河北南宫县的一所中学教书。原党委书记、总务长俞时模，被送回老家安徽。原物理教研组党支部书记陈纲，随丈夫调到新成立的北京工业大学。以上四人，文革前已经不在清华。其他离开清华的，也有少数，如原工程物理系实验员、团支部书记刘某某，被开除送回原籍辽宁。其余三类（开除留用）、四类（留用察看）、五类（降职减薪）至六类（免于行政处分），大多留在清华。

在清华的右派，副校长钱伟长，原水利系水文教研组主任黄万里，原无线电系系主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孟昭英，皆是著名教授，此时均降级留用。无线电系的常迥、物理教研组的何成钧、数学系的李欧等教授、副教授，摘了帽子，仍可上讲台。但何成钧因讲课时说因吃不饱，瘦弱得连手表带都松了，被学生反映上去；李欧因讲课水平高，有学生表示崇拜，引起党委的警惕，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讲师、助教一级的右派，多数摘了帽子，在认罪态度好，积极改造的前提下，安排了教学或其他岗位。如物理教研组的张三慧、原电机系党总支书记吕森等，到清华附中任教，被认为表现不错。原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委员李X平，教物理实验课，助教牟某某（原物8学生），教物理小课。体育教研组的王维屏、曹宝元、杨璞等仍在教体育。土建系的程应铨，除上课以外，还经常在校园内外照相。

原政治课教研组出的右派较多，当然不能再上讲台，多数去了图书馆。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道晖，摘帽后到《新清华》当了一名编辑。

文革前的1965年，右派没有摘帽的只有二十名左右，他们或是因为认罪态度不好，或是因为与基层领导关系不睦，且多数是职员，在校内影响不大。但党委没有忘记他们，由党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艾知生主持，办了约两个月的“学习班”，每天晚上学习，写检查，意图是准备给他们摘帽。但1966年初，文革的风声越来越紧，此事不了了之。

那时在校的大学新生，每年入学时都要看反右斗争展览，多数受到深刻教育，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深恶痛绝。而现实中看到的右派教师，又学识渊博，和蔼可亲，部分同学也产生了困惑。

还有部分原学生中的右派，在劳动改造后，摘掉帽子，回到学校读书。关于他们的情况，王铁藩学长已有回忆文章。本文不再叙述。

总之，文革前夕，清华园里的右派分子基本上是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少数表现积极，真诚悔过；多数埋头工作，夹着尾巴做人；还有少数坚持自己无罪，但未公开翻案，如黄万里仍然坚持自己在水利建设上的观点；原党史教研室主任刘弄潮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反右时在大连疗养，根本没有右派言行，划为右派是搞错了。

二、警惕的眼睛

1966年6月1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公布后，清华园开始乱起来。在“清华党委是姓马还是姓修”，“保蒋还是反蒋”问题上开始争论。多数学生持“保蒋”立场，少数学生怀疑蒋南翔和校党委，并贴出大字报。只见党委派人将大字报拍照，看到此情况的学生联想到反右派斗争展览中展出的右派的大字报照片，不寒而栗。留校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对学生说，1957年我也被右派贴了很多大字报，没有什么可怕的，坚决顶住就是了。话传出来，不少人以为第二次反右斗争又会到来。工程物理系部分学生怀疑校党

委，晚上集合在一起议论，并在系馆附近活动。系党总支布置，要追查有没有右派分子在背后煽动。有些单位的党员开始注视曾被划成右派的职工的行动。

此时的清华党委，确实认为1966年夏天的形势如同1957年的那个“不平凡的夏天”。清华教职员中200余名摘帽或未摘帽的右派，加上家属就有1000多人，他们中有些亲戚好友也在清华。还有虽未划右但属于“中右”、“右倾”而受过党内处分的（如土建系党员教师陶德坚），这些都是潜在的反对力量。

关在监狱里的徐璋本，1957年要求成立“劳动党”，在一位教授家里当着好几位教授宣传自己的主张，入狱后仍不承认罪行，他主张的政治民主和人权观点，是否还有市场？他提出的“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的观点，是否会给中共的指导思想构成威胁？

远在河北农村的袁永熙，曾被许多教师认为很有水平，他的民主思想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是否还有影响？近在清华园里的黄万里，在治理黄河方面的独立见解和在《花丛小语》中对“歌德”（歌功颂德）、“但丁”（盯着党员领导干部，亦步亦趋）派的讽刺让人印象深刻，曾经有数名学生为他辩护，他划右后尽管受到领袖的点名和父亲黄炎培的斥责，仍我行我素，被一些人暗中称为“硬骨头”，他的能量岂能小看？

还有那些虽摘了帽子，但主要是考虑国际影响问题（如钱伟长），他们是否再暗中煽风点火？蒋南翔和清华党委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各党总支领导也多是反右时的积极分子，一双双警惕的眼睛时刻在盯着那些“人还在心不死”的右派们。

如果是真的第二次反右斗争，他们丝毫不会手软。但这次文革开始，毛的布局恰恰与上次的“引蛇出洞”不同。工作组进校，宣布蒋南翔停职，校党委停止工作。第二次反右的设想没有实现。

三、蠢蠢欲动

从工作组进校到离校的近两个月里，清华园里打倒蒋南翔、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确实有一些老右派看到蒋南翔成了黑帮，试图观察形势，有所动作。但“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也看在眼里，不忘给予揭露。

大礼堂前，草坪周围，夜晚灯火通明。在观看大字报的人群里，可以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钱伟长、张三慧等“摘帽右派”也在仔细地看大字报。多数人没有注意到他们。但有些警惕性高的群众还是发现了他们。一张题为“大右派钱伟长笑了”的大字报贴出，说钱伟长在看大字报时面露喜色，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其实，钱伟长的长相就是似笑非笑的样子，他看大字报时到底是笑了还是没笑，很难判断。物理教研组也有人贴大字报，警告张三慧，不得趁机翻案。在图书馆一楼，有老右派也写大字报，拥护工作组，批判校党委，革命群众马上制止，要求防止他们“浑水摸鱼”。工作组离校后，八八串联会开会时，物理教研组一位教师上台发言，台下有人递纸条，说发言者是摘帽右派李X平，但发言者解释说，我不是李X平，而是李Y平，名字有一字之差，你们误会了。确实，李Y平不是右派，但他50年代曾经被打成“托派”，也是“反党”的，故也被排除于革命队伍之外。直到80年代，他的问题被查清，属于冤假错案。

蒋南翔和校党委的倒台，肯定引起了老右派的翻案幻想。但清华右派并没有一个公开翻案的，也没有混入“革命队伍”，企图借机造反的。而在全国其他地方，确有原右派分子“混入”革命群众队伍的，也有“造反派”为右派翻案的。而在清华，无论哪一派造反组织，都不允许右派参加，更没有给他们翻案的。少数右派观察形势，只是在“窥探”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但运动初期，群众组织对他们就充满警惕。他们仍然要提心吊胆，担心大祸临头。

从1966年6月1日到10日，短短10天，蒋南翔和清华校党委就垮台了。如果时间更长一些，他们完全可以轻车熟路地运用反右斗争的经验和做法，把反校党委的学生打成右派。

清华基层党组织成员多数持“保蒋”立场，也完全是把“反蒋”者看做是右派行为。工作组进校以后，和全国各地派出的文革工作组一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干扰”运动，把敢于反对、攻击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刘少奇说：“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定了调子。刘邓们还认定：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遂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反击。“反干扰”运动于六月下旬展开，工作组组织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激进学生压下去，声称“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在50天的“反干扰”运动中，仅北京高校就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清华则有近700人被打成“蒯派”。此时，“蒯派”心里担心的是落得“右派”的下场，而原来的右派也自然会从“蒯派”身上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

四、在“红色恐怖”中

1966年8月24日前后，是清华大学红卫兵掌权。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传入清华，以血统论来打击反对者来保卫自己的地位无疑是他们的重要策略。眼看校园内给刘少奇、王光美贴大字报的越来越多，镇压“黑帮”（已经被揪出的清华原领导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则可达到转移方向，保爹保妈的效果。于是，1966年8月24日晚，在撕毁大字报，拆除二校门的同时，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把原校党委成员和部分中层干部抓来毒打，并强迫他们搬运二校门的碎石。他们也没有忘记那些老右派，于是，钱伟长、黄万里等人也遭到毒打和强迫劳动。

另外一支人马，在派出所人员的带领下，进入家属宿舍，打人抄家，一些右派的家被抄，人被剃阴阳头，受到打骂。一直到夜间，全校“红卫兵战歌”的广播和“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抄家、打人的声音不断。原政治课教研组摘帽右派黄延复因母亲是贫农，与周围人关系尚好，暂时还未受到冲击，只见已经60多岁的老

右派刘弄潮慌忙跑到他家来避难，黄将他收留，二人一夜未睡，捱到天明。据后来统计，一些教授以及原右派的家被抄的，有现金、存折、银元、衣物、古董、邮票等，有些被抄家者据为己有，有些下落不明，只有部分登记造册，文革后返还。其中，钱伟长因长期集邮，存有大量珍贵的外国邮票，被抄走后下落不明。

五、打击与洗劫

原清华大学红卫兵垮台后，清华进入井冈山兵团掌权时期。不久，414派兴起，与井冈山兵团中的团派争斗。在一个时期里，两派似乎忘记了清华园中的右派，争论的重点是如何对待原清华的干部。但是，很快，两派的争论涉及到了原来的右派分子。414的理论家周泉纓在著名的《414思潮必胜》中，多处提到作为与地富反坏并列的阶级敌人——右派。

在《414思潮必胜》中，周在分析文革中的阶级关系时说：

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

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

在分析清华文革中的派别时，他特别指出：

从组织上看：四一四派的队伍是比较整齐的，造反派中大多数的工农兵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四一四派。而团派的队伍是称不得整齐的，还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

在文章中，他运用文革前通行的阶级斗争理论，上纲上线地将团派说成是“阶级敌人”的保护伞和避风港：

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地富反坏右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顽强地活动起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主要是团派）。

值得注意的是，周泉纓不仅说右派分子混入了团派的队伍，还加上了“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这就说明414的一些人希图把更多的知识分子打成新的右派。

《414思潮必胜》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全国各地，文革造反派与前右派之间的政治血缘联系，反映在有相当数量的右派、“摘帽右派”或“内定右派”分子，直接参加了造反派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父母都被划为右派的《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回忆说，首都中学造反红卫兵报纸“《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唯一的一幅漫画，是一位年轻的右派工人画的，他叫任众，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在湖北著名造反派组织“北斗星学会”成立之际，在出席开幕式的不到一百人中，竟有1957年被定为“右派”的“老右派分子”，后成为不同政见作家的白桦。在清华，红教联组织中，有的教师被414一些人看做是漏网右派，红教联中一些人提出的“政治地位决定论”，“工资200元的教授不一定比工资50元的党员干部思想不革命”，被认为是十足的右派观点。

尽管414派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并不完全同意周泉纓的观点，但《414思潮必胜》仍然被看做是414派的宣言书和纲领性文件。由于团派和414派双方思想上深刻的分歧，利益诉求的巨大差距，不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而且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残酷的武斗。

414派不仅在理论上宣称右派是主要敌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他们把教师组织红教联作为打击对象，认为红教联里藏污纳垢，队伍里有“漏网右派”，把红教联负责人陶德坚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了批斗（陶德坚1957年反右时因与右派分子未划清界限而受到党内处分），并追查红教联与北京地质学院右派分子的关系。

已经加入井冈山兵团的红教联，在414派的打击下，很快瓦解。而团派负责人也不得不与红教联摆脱干系，宣布将红教联清除出井冈山。

团派虽未将右派列入打击范畴，且在与414派的争论中，说自己的队伍是纯洁的，并未有右派或代表右派利益的人混入，但有少数骨干（如总部委员崔某某），是同情红教联的。

到了1968年4月，团派和414派的武斗开始后，414派为了坐实团派“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抓来了他们认为是团派后台的“右派分子”左羽先生，关在科学馆里，并施加体罚。团派中的部分人，则为了搜集武斗经费，去右派家里抄家，索要钱财，行为都非常野蛮残忍。孟昭英先生为了躲避追索，从楼房坠下，将腿摔成骨折。笔者亲眼看到孟先生受伤后躺在地上，对一些围着他的人解释说家里被抄几次，实在没有钱了，请红卫兵小将原谅。在文革中，孟先生自身受伤，妻子患病多年后去世，儿子一死一疯。命运极为凄惨。

在此前后，原清华党委常委、总务长俞时模在安徽被活活打死。被送往黑龙江农场劳动改造的原清华学生右派郭道宏（四川隆昌人 电机系，1953年考入）他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即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张行陶（江苏海门人）因心脏病死亡。

六、如此再教育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开始了长达8年的“工宣队”统治时期。从1968年冬季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到“清查516”，再到去江西鲤鱼洲五七农场，右派们和所谓“漏网右派”，一直被折腾。1968年底，被认为极有才华的土建系讲师程应铨含冤自尽。1970年，已经年过六旬的黄万里先生，在反复被批判后，下放到鲤鱼洲，从事繁重的水田劳动。一天夜里，劳动了一整天，疲惫不堪的人们被叫起来，批斗黄先生，原因是他因为饥饿，吃了几块饼干，被说成是抗拒再教育。从鲤鱼洲回来后，黄先生又被送到三门峡劳动，继续接受再教育。整整10年，未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为了炮制“六厂二校经验”，体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工宣队给部分尚未摘帽的右派摘了帽子。对某些服从改造，迎合迟群、谢静怡的人，则树为“认真接受再教育”的典型。如钱伟长，在车间劳动时流了一身汗，和工人在一个浴池里洗澡，感到“汗水流在了一起”，思想感情也和工人阶级接近了。并称自己解释不了工人提出的金属材料变形的问题，只能

笼统地回答为“应力集中”，可见“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迟、谢将钱的表现写进“六厂二校经验”，获得毛的肯定，转发全国。

七、改正后的喜与悲

1978年底，在胡耀邦主持下，给绝大多数右派做了“改正”。清华的右派，百分之百都得到了改正。人们发现，去除了被涂抹的黑色油彩，他们并非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而是一群真正的爱国者，正直的知识分子，优秀的人才，民主的先驱者。如黄万里先生，年轻时改学水利，立志报国，在三门峡方案上坚持正确立场，他的《花丛小语》写出了知识分子关心国计民生的拳拳之心。又如孟昭英先生，出身贫苦，（父亲是一名清朝士兵，因参加反清革命被杀害）在亲友的资助下刻苦攻读，是中国电子学第一位学部委员（院士），改正后出国访问，回国后将当时很难得到的美金配额交给校医院买了医疗设备。刘弄潮先生并非历史复杂，对党不满的老右派，而是一位从少年时代就立志救国救民，不惧艰险的革命者。左羽先生被发现原本并未被正式划右，却被当成右派20余年，是一位早年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党员，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改正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阻力。蒋南翔和原来的反右积极分子实际上是不情愿的，设置了一些障碍。如钱伟长是改正最晚的，也没有恢复清华副校长的职务。张三慧的右派虽获改正，但党籍却未能马上恢复，直到一年多后才解决。

改正后，他们多数都恢复了职务，发挥了专长，为国家建设和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一部分尚比较年轻，身体也较好，在改正后努力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如常迥教授，70年代末进行信息科学研究，其中广义拉德梅克函数系理论和信号重构理论及应用的研究受到高度评价。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加入了中共。

物理教师张三慧也认真教书，并编写了多部教材。调到北京工业大学的陈纲女士，成为著名物理学家。

郭道晖先生改行从事法律工作，成为有影响的法学家。原政治课教师黄延复先生努力研究清华校史，成为专家，在校史研究方面做出宝贵贡献。另一位原政治课教师张春晖则成为图书馆专家。左羽先生恢复党籍后，也从事法律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有些则虽获改正，恢复职务，但垂垂老矣，未获重用，壮志难酬。

如黄万里先生，关于三峡建设的意见始终未得到采纳，在校内连博导也没有评上，2001年赍志而歿。1991年，黄万里先生自费印刷了诗集《治水吟草》，在自序诗里回忆自己的一生“辄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有策犯鳞何足忌？垂危献璞平生志。”坚持自己的志向“文山气节董狐管，念想元元未封口，总是挚情忧国泪，非关傲世妄归咎。”表达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赤诚之心。

徐璋本先生1979年获释后回到清华，拼命工作，欲在物理学方面取得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幸积劳成疾，于1988年去世。这一年元旦，徐璋本给钱学森寄去贺年片，钱学森于1988年1月4日给“璋本师兄”亲笔复信。徐璋本在贺年片上写着“我们友谊”“随岁月而茁壮”，而钱学森也感叹“我们是六十多年的同学学友了呀，中间多少事啊！”钱学森在复函中抄了赵朴初的元旦献词《调寄驻云飞》给徐璋本，歌颂“开放风云会，改革洪波沸”“神龙起迅雷。澄清积痼。万里长空，四海光明被。十亿同心振国威”的“大好形势”，不过，那张贺年片上的画，却是“雾蒙蒙雪地上蒺藜遍野”。徐璋本选择了这样的贺年片寄给钱学森，是因为他的人生如同“雪地上蒺藜”，20年的牢狱之灾使他如同生活在寒冬之中，此时对前途也未表乐观。

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文革中在河北南宫县受到残酷迫害，受到后妻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前妻陈琏被迫离婚，在文革被迫自杀），改正后曾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后患病去世。

孟昭英院士在浩劫中身体受到摧残，又失去了妻儿，幸得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女士帮助介绍了一位善良的孟女士与之成婚，读过了平静的晚年。

刘弄潮先生是上个世纪20年代入党的老革命，曾与李大钊、鲁迅联系，从事过多年地

下工作，是不可多得的党史重大事件的见证人。他虽年事已高，仍积极参加党史研究工作，80年代后期离世。

反右中因同情右派受到党内处分的陶德坚老师，文革中被定为清华唯一的516分子，文革后亦未得到平反，后由教育家朱九思调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任建筑系副主任，为筹办该校建筑系做出贡献。退休后去加拿大定居，不幸于1997年病故。

还有极少数，接受了“教训”，成为“左派”，得到了重用。有的处处表现很左，紧跟上级领导，有的不惜举报老朋友私下的言论，被认为“表现很好”，得以提升。

还需要说说的是上述人士的子女后代，除少数文革前已经上大学或自学成才外，大都因父母的牵连，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除少数自学成才外，许多很有天资的人都未能继承父业，耽误了人生最好的时光。1990年夏天，笔者在燕郊火车站见到孟昭英先生的孙子，他是一个公司的普通计算机维修人员，正背着工具包在炎炎烈日下奔走，与之攀谈后，不胜唏嘘。

八、结语

1. 1957年反右中，北大的右派分子中，以学生右派影响最大，如林昭、谭天荣等。当年5月19日他们贴出一批大字报激烈呼唤民主，尖锐地反对独裁专制，被称为“519运动”。而清华，则是以教师中右派的思想更为深刻系统，如徐璋本、黄万里、孟昭英、钱伟长等，或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对一党专制和一种思想的统治；或在工程建设中主张从实际出发，反对违反科学的长官意志；或在高等教育方面主张通才教育，反对党委体制、外行领导内行。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从“右”的方面修正现行体制，是知识界追求科学民主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文革中，造反派则是从左的方面反对以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右派和造反派的思想基础不同，因而，二者原本没有共同的交集。但是，造反派和右派反对的对象却相同。特

别是激进的造反派——团派提出的“彻底砸烂旧清华”的口号，肯定在右派们的思想中得到了共鸣。运动初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右派们不会贸然造反，也不可能加入群众组织，但是随着运动的展开，出现了大约两年时间的“历史的空隙”。在这段空隙中，部分原学生中的摘帽右派也参加了一些串联和群众组织的活动，但教师中右派仍不敢有过多的举动，他们与造反派的真实关系，不是大部分亲身参加造反，而是大部分内心同情造反。他们的部分政治诉求，主要是通过由长期在清华处于弱势群体的一些教师参加的红教联来间接表达的。

2. 清华1957年的反右斗争，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而且在教职工和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数人对右派的警惕性非常之高。不仅在运动初期如此，在中后期依然保持很高的警惕。学生周泉纓的《414思潮必胜》的写作，就有参加过反右的干部、教师的参与。他们不仅时刻警惕着右派混入群众队伍，而且把团派看做是右派的保护伞和代言人。这充分体现了原体制反右时的力度之大和对干部学生的“洗脑”之成功。

3. 团派的领导层尽管与右派没有任何牵连，而且与红教联始终保持距离，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砸烂旧清华”的口号与当年右派的目标有相似之处，但客观上团派对原有体制的冲击是暗合当年右派的意图的。而且，团派的组成，无论是学生还是教职工成员，许多都是在原体制下受压或不受重用的，可称为“劣质群体”或非主流群体，这一群体，和1957年受到打击的右派及犯有同情右派错误的人，天然有着相似性。但他们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左倾激进主义，与1957年右派的思想资源西方民主思想不同，在他们掌权期间，对“右派”实为避而远之，但从未像官办红卫兵那样残酷地进行迫害。而414派中的多数学生及他们要解放的干部（干部问题是两派分歧的重要起点），多为原体制下的“优质群体”或主流群体。清华的主流和非主流派别，正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形成的。蒋南翔1952年来清华，在1957年后通过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才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清华体制，成为“不漏气的发动机”，其体制力量是非常强的，维护其体制的原既得利益者也是非常多的，他们绝不甘心看到“右派翻天”、“痞子掌权”。从这个角度看，团四斗争的发生并发展

到你死我活的武斗局面，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的必然性。

4. 虽然清华的右派百分之百都获得了改正，改正后许多人也重获新生，取得相当的业绩，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他们曾经大声疾呼过的科学民主的口号和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几乎已经被遗忘。他们中一些先驱者的宝贵思想火花也似乎稍纵即逝，至今没有被整理和研究。他们对专制体制的冲击和曾经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包括文革时期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在内的文革造反派远远没有达到的。近年来，北大原学生中的改正右派，每年都在校庆（五月四日）时高举“右派冤”的标语回北大要求彻底平反，落实经济待遇，曾得到原副校长沈克琦先生的同情和帮助，而清华则无声无息。周启博校友为此曾著文《清华没有沈克琦》。我们看今日高校衙门化的严重，功利主义的盛行，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利己主义的精致化，也只能叹息“清华再无徐璋本”、“清华再无黄万里”。■

参考文献：

- [1]王学泰：钱学森同学徐璋本：曾想与毛竞选主席. 水煮百年网
- [2]赵诚：黄万里的长河孤旅.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 [3]甘犁：弄潮儿向潮头立 刘弄潮传奇. 《红岩春秋》2006年第4期
- [4]陈必大：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袁永熙. 新浪博客.
- [5]张卫平：回忆父亲张三慧 - 兼记大动荡时代的两辈知识分子. 家在清华网.
- [6]陶德坚：风雨人生. 五柳村网站
- [7]黄延复：五七风暴. 博客中国
- [8]周泉纓：414思潮必胜. 天涯博客
- [9]周伦佐：“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 2013年12月2日“爱思想”网站

2016年11月15日写

2017年2月8日修改

【评论】

“自由退出”与“言者无罪”

——纪念右派蒙难60周年

吴美潮

引言

60年以前的1957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是指导中共整风运动全过程的文件。中共在全部整风时期均按照《指示》进行。换言之，《指示》在全部整风时期都是有效的。《指示》中的“自由退出”及“言者无罪”两句最耐人反思。笔者不嫌浅陋，兹论述一二，并认为是一种欺骗，从而对欺骗后果及真话真难进行阐述，以纪念55万右派蒙难60周年。

一、“自由退出”

《指示》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记载，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说：“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²

中共的这次整风运动，中共党员是要参加的。而非中共党员如要参加整风，必须是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我是经历整风全过程的人，从我的经历，对非中共人士绝无自愿一说，完全出于强迫。例如当时听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演讲传达，是要100%的师生参加，以后听整风动员报告，参加小组讨论，也是要100%的师生参加，完全出于强迫的。至

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N]. 人民日报, 1957. 5. 1

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3）[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于“允许随时自由退出”一句，更是说了不算的谎言。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林希翎、谭天荣等均为非中共党员，他们在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反右派时能“自由退出”吗？55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绝大多数为非中共党员，但迄今为止还不曾听说有几个分子在鸣放、反右、整改等各阶段中提出本人不是中共党员而自由退出的。

笔者是一名“自由退出”分子。1953年—1957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1957年毕业前夕，刚好碰上了千载难逢的中共整风。1957年5月起参加了鸣放，1957年7月22日，电器四团支部召开会议揭发批判我的右派言论，会上有不少不实或过火之词。我缺乏修养，一气之下宣布自由退出整风回乡下老家去了，7月28日随学校专派的两人强迫我返校接受批斗，7月29日，在千人大会上被缺席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为此，大家对我擅自离校狂轰滥炸，我作了多次检讨也未能通过，说我是“东游记”式的检讨，对抗运动，罪加一等。

中共官方文件认为反右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个阶段，反右是列在鸣放之后、整改之前的第二阶段，是大运动整风中的小运动，是二级运动，不是独立的一级运动。因此，整风反右的提法不妥，它是整风中的反右。我敢于“自由退出”一周，可能在全国的反右中是罕见的事件，冒中共之大不韪，也可以算是一种勇敢精神。我为此鲁莽冲动追悔莫及，懊恨了60年。今天，重新学习《指示》，“自由退出”是被允许了的，我是无罪的。于是我又自问：55万人都不“自由退出”，他们何等聪明，难道不懂得“自由退出”？我是对抗运动，还是遵照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指示？至今仍是一头雾水。旁观者清，恭请那代的耄耋老人和当代的年轻人给予指导。

二、“言者无罪”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共产党的缺点可以批评，

人民政府的缺点可以批评，言者无罪。”《指示》说：“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言者无罪”是被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规定的原则，是要坚决实行的。

1957年的55万右派，基本上都是在言论上出了问题，是整风鸣放会上放的，是言者。照理说，按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原则，言者应是无罪的。可是事实是，言者都是有罪的，55万名右派几乎全部丧尽尊严地检讨了，向党向人民向毛主席请罪，检讨通过后基本上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有的劳改，有的劳教，有的罢官，有的降职降薪，有的下放监督劳动，有的开除学籍，有的工作考查，有的被杀，有的自杀……统统成了反面教员，成为最大限度地孤立与打击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言论自由，即言者无罪，是全世界认可的普世价值。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的第19条说：“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共和国的《宪法》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言论自由”的内容。1954年的共和国宪法第87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言论自由是六大自由的第一大自由。毛泽东、中共中央在1957年5月说的“言者无罪”是正确的言论，他们开展的鸣放行为是正确的行为。可是，毛泽东、中共中央在1957年6月8日以后的“言者有罪”的言论和行为则是错误的，它违背了“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今天，必须进一步进行反思，重申“言者无罪”的原则。

三、欺骗后果

悠久的中华文明，始终存在正反两面的文明。正面的提倡“信、和”，奉行“信为千善之本，和乃万福之源”。而反面的提倡“假、斗”，奉行“兵不厌诈，斗乐无穷”。文

革时期的一句“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说明一切，政治与骗子相互组词。人们企望反面的“假、斗”尽量缩小，正面的“信、和”尽量扩大。

反右运动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胡平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毛泽东的确是在党内和党外、高层与下层两个战场上，同时打了一场大战。两个战场的区别在于，一个战场上风云变色，明火执仗；另一个战场则云遮雾绕，兵不血刃。”¹反右是战场，是军事，军事家们兵不厌诈，政治家们是“政治骗子”，商人是无商不奸，学人也是学术造假，然而，人们要求的是“君无戏言”，更无诳语，一言九鼎，诚信第一。把普通的民事活动当作一场战役的军事行动，进行欺骗，多么恐怖与恐惧呀！把社会搞成恐怖场，按《世界人权宣言》是反人类的。

从“自由退出”到“不能退出”，从“言者无罪”到“言者有罪”，是明目张胆地欺骗，是君王欺骗，是具有示范作用的欺骗。从此，大地上万马齐喑，三面红旗，四个伟大相继发明，饿殍遍野，怨声载道，浩劫丛生。我在1962年6月2日的《日记》中有段勇敢的描述：“谈到1958年的错误，1957年一役（指反右派），1958年跃进，1962年吃苦，为什么？右派一棍子打昏了，中派一下子吓昏了，左派一阵子冲昏了。知者未言，急者为所欲为，岂有不谬之理。出现了现实封神演义，亩产20万斤，一天等于20年-----”

四、真话真难

最近，俞正声在政协会上说：“支持讲真话，道实情。”讲真话要政府支持，真话真难。

俗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则是：一次说假话，百年不真话。说真话真难。人类早已进入信息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新时代更需要人们讲真话。然而事与愿违，一些人惯性使然，仍在喋喋不休地说，“自由退出”与“言者无罪”是何等的伟大、光荣、正确呀！不仅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连共和国的《宪法》第33条也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¹ 胡平：《禅机：1957 苦难的祭坛》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第449页。

¹共和国的《民法通则》又说：“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² 要求所有参与民事活动的人讲信用，诚实不欺。

2016年，白岩松在一次演讲中说：“明年即2017年，是中国大陆‘打右派’一个‘甲子’。右派们也还有尚在于世的，他们像大熊猫一样，既是活化石标本，又是反面教材。准备讲真话的朋友，至少要先问问那些还活着的右派化石们，在这样一个国家，尤其是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可不可以讲真话。我想得到的回答，一定是满腔的冤屈、愤怒，进而是仇恨，最后还很有可能会骂一句：骗子，大骗子！”

2016年，龙永图说了真话，他为什么送外孙女去美国。他说，一是培养孩子的诚信，不说谎是基本底线，但是我们今天的孩子没有几个不说谎的。³

1957年，社会把诚信彻底打碎了，今天要想恢复的话是难乎其难，只有正本清源，认真总结右派蒙难的教训，妥善处理历史问题，鼓励说真话，才能做到真话不难。

一个甲子前，至少还有55万人敢讲真话。60年后，普遍感到道德滑坡，假话遍地。中共提倡中华复兴，使衰落后的道德再恢复起来。先恢复到60年前的水平，以后再振兴中华，使讲真话兴盛起来，讲真话不再难。

结 语

幸存的任何上过“言者无罪”、“自由退出”大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应该拿出60年前讲真话的勇气，口述笔述自己最熟悉、最伤心的经历，从而分析批判说假话的危害，鞭挞思想罪、言论罪的残暴。为中华民族流尽最后一滴汗，促进人们说真话，作一个科学人，老实人。这是一件真正正确、光荣、伟大的事业，更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¹ 全国人大. 共和国宪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² 全国人大. 共和国民法通则[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³ 龙永图. 从我送外孙女去美国谈谈中国的教育[J]. 现代教育家，2016（6）

【读书】

拒绝遗忘：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读张先痴《格拉古梦魇》

钱理群

张先痴先生在出版了《格拉古轶事》、《格拉古实录》两书以后，又写出了这本《格拉古梦魇》。他在来信里告诉我，写《轶事》时视力已经衰减，《实录》是在半失明下勉力写成，这本《梦魇》就只能自己口述，由朋友记录、整理了。这可以说是拼了命也要写出他所经历的一切：这是为什么？张先痴先生在书中谈到一位难友李盛照，他“终其一生力图追问大饥荒的真相”，“始终如一地抗争”，“戴着20斤的脚镣在两米见方的黑监中，一关就是七年”；在出狱以后的这几十年也一直念念不忘“还原历史的真相”。直到2013年11月的一天，还打电话给张先痴，商量如何进行，第二天就意外离世了。张先痴大为震动，发誓要“为这位伟大的朋友与他的未尽之愿着落笔墨，也许就像李盛照的一生：作为一种反抗”。张先痴深情地写道：“眼看身边的难友一个个弃世而去，他们中每一个人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无一例外地都有太多的故事需要讲述，否则历史的真正样子就会淹没在无数的谎言中，无法辨别，无人知晓”。而历史真相的被淹没、曲解，也就意味着拒绝吸取历史的教训，拒绝对造成历史悲剧的体制弊端进行根本改革，历史就有重演的可能，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也都表明，这绝不是杞人之忧。这正是让历史亲历者寝食不安，死不瞑目的。拒绝遗忘，对自己和自己这一代人的人生故事作“一个完整的交代”：这几乎成了张先痴这样的幸存者的历史责任。

而张先痴将他的人生故事，以“格拉古轶事”、“格拉古实录”、“格拉古梦魇”命名，构成“格拉古三部曲”，更是意味深长。所谓“格拉古”是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流

放所”名称的倒写，暗示中国的劳改所是斯大林的流放所，或许还有希特勒的集中营的延续和发展。这样，张先痴先生就将他和这一代人的悲剧置于世界范围内加以考察，追问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权体制（苏联模式，中国模式）和法西斯体制的根本问题。这就具有了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和历史深度。

但作为一种历史的叙述，张先痴先生书写的重心，还是在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我读这本《梦魇》，最感触目惊心的，就是全书文字背后或显或隐的恐惧感。张先痴先生说，他“努力回想幼儿时期记忆的起点，探寻能记起的最早的事，竟然多多少少都带着些恐怖”，例如在火盆边烤火，围兜被引燃，吓得大哭；父亲买给自己的气球突然爆炸，又吓得大哭，等等。接着就是抗战中的逃难，躲警报；国、共两党内战兵荒马乱中的逃亡，时刻感到死亡的威胁。参加革命以后，首先遇到的却是父亲的被枪杀，尽管划清了界限，但想到父亲曾有过的“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的预言，仍然在暗地里失声痛哭：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革命的恐怖。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参加土改运动，自己却成了恐怖的制造者：他用手枪敲打一位老地主，看到“老人那张因饱受惊恐而发抖变形的脸”，自己也感到惊恐不安。而在凉山执行任务时，为了威慑彝族而炫耀武力，看到“全体头人立即扑倒在地，浑身颤抖哆嗦不已”时，甚至觉得自己也成了“妖魔”。以后的事情更出乎意外：1954年肃反运动以后，中共中央一纸决定，把自己这样的“直系亲属在运动中被杀的人”（内部称呼为“血仇分子”）一律从要害部门逐出，张先痴从军队转业地方，从此，专政的利剑高悬头上，恐怖也就如影随形。无论是打成右派，还是送进劳教队，都落入“控制得严丝密缝，少有疏漏，而且有严厉的监控、惩治机制”的“天罗地网”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没有任何安全感。张先痴曾经试图逃跑，最后还是收入网中，陷入更大的恐惧之中。（参看钱理群：《一个人的命运及其背后的社会体制的整体运动——对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的一种解读》）直到文革结束，张先痴回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在内心深处，恐惧依然存在，“睡梦中经常会出现受苦刑，甚至被宣判死刑的恐怖场面”。这不仅是“苦难记忆仍在心底发酵”，更是现实的存在：专政的利剑依然高悬在每一个坚持独立思考者

的头上。张先痴本人就是因为执意要恢复历史的真相，再次被“请进”警察机关谈话，继续处于街道上的协警员的严密监控之中：无论是谈话，还是监控，都是在制造恐怖。（参看钱理群：《历史在继续——张先痴〈格拉古实录〉序》）这样，恐惧、不安全感，就成了极具极权体制特色的精神现象，张先痴终生无法摆脱极权体制的控制，因此他说自己“生命的基调就是恐怖”。问题是，这样的饱含血泪的人生总结，并不仅仅属于张先痴先生个人，而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还是几代人）的历史命运。我现在终于明白，张先痴先生以“格拉古梦魇”作为本书的书名的深意了：这是宿命，我们至今也还没有走出“梦魇”。这是不能不让人悚然而思的。

引发深思的，还有张先痴笔下的家庭故事，他对父亲、母亲和妻子的回忆。这是本书最为惊心动魄之处，也是我读了最感共鸣之处。我和张先痴都出身于国民党高级官员家庭，都经历了国共两党分裂下的家庭分裂和生离死别；但张先痴的家庭悲剧却远比我惨烈。和我父亲仅是一个技术官员不同，张先痴的父亲年轻时就深深卷入了国、共两党之争，他曾是一个共产党员，后来又加入了国民党，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变成三民主义的信徒。在历史的巨变中这样的个人思想的变化，本属正常；但张先痴父亲的悲剧却在于，当他选择了国民党，并成为其中央委员，担任中央警察总署副署长、中统华中区负责人等要职时，国民党建立的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党专政的政权，不仅背离了原初的三民主义理想，而且不可避免地发生腐败，最后甚至连自己也几乎是身不由己地陷入谋取私利和颓废的泥潭之中。当儿子张先痴第一次问他，国民党为什么最终溃败时，他回答说：“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跨的，而是他的腐朽把自己垮掉的”。但他同时又坚信“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这就走到了绝境。前文谈到他发出“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的预言，就不是偶然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却在时代的激进思潮的影响下，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从小给孩子灌输的公平、正义等观念的引导，逐渐远离国民党而倾向于共产党。父与子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儿子一再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父亲反问道：“你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儿子用挑衅的口气回答说：“至少共产党没有特务”。这就直接

伤害了被视为“特务头子”的父亲，他突然大发雷霆，吼出让儿子以后终身难忘的一句话：“你懂个屁，他们每个党员都是一个特务！”此时的儿子自然听不进去，当即和父亲争吵起来。最后父亲一声命令：“你给我滚！”年仅16岁的儿子冲出家门：父与子彻底决裂、分离了。

这是那个历史大转折时代的典型现象。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在那个年代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和父亲不同的道路。我的父亲则在共产党兵临城下时，先到了台湾，没有来得及把滞留上海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接走，随着解放军攻克上海，全家就此分隔在海峡两岸。张先痴的父亲本也可以从西昌机场先行撤离，但他为了寻找困在乐山的母亲和全家人，毅然返回，最后滞留大陆，又被人检举而遭镇压，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

更大的悲剧却在于，当父亲被押送刑场，沿街示众时，恰恰被此时已是解放军战士的张先痴看到。作为儿子的他，“唯一的想法居然是今天的下场是他罪有应得”，并立刻向部队领导汇报，表示“绝对拥护党和政府对父亲的处理”。这样的“站稳立场”，今天看来确实难以理解，但在那个时代，却是自有缘由。这就谈到了一个或许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我在一篇文章里特意谈到1949年以后大陆意识形态和体制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而对张先痴和我这样的出身于“反动家庭”的人，思想改造的核心是要和“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而所谓“划清界限”就是“从灵魂深处，把血肉相连的父亲形象挖去，最后一点亲情也要遗忘殆尽，换上一个外加的‘反革命’恶魔的身影，从而将爱转化为恨，自动地向父亲泼脏水”，“这无疑是一种强迫，因为划不清界限本身就有被划出人民的圈子，成为专政对象的危险”，“但还要将强迫变成自愿：制造种种理论，把划清界限崇高化”，什么“大义灭亲”，“为革命牺牲”，“在阶级社会里，父子关系首先是阶级关系”等等。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体制的威慑和革命伦理的蛊惑下，半是被迫、半是“自觉”地和父亲“划清界限”，无情地伤害养育自己的父母，也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我的家庭回忆录》“代前言”：《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恐怖的记忆，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不仅要对人进行行动的控制和肉体的摧残，而且要控制

其心灵及思想，进行精神凌迟，最终使其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以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一统。这可以说是中国的“格拉古”极权体制对斯大林的“古拉格”极权体制与希特勒的法西斯极权体制的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创造性”发展吧。

这样的家庭分离、父子反目的大悲剧，还有一位不可不提的承担者，这就是母亲。于是，就有了本书最为动情的文字：《我的母亲》。母亲也是民国新女性，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结婚后就成了主持家务、养育子女的主妇。四十岁时，突遭横祸：父亲被捕枪毙，一夜之间，由受人尊敬的夫人变成反革命家属，成了人人都以怀疑的、甚至敌视的眼光望着的“不可接触的人”。而且家中经济来源彻底断绝，母亲还得自己打零工，维持全家生计。在儿子张先痴被送去劳教以后，她更是日夜担心，抚养孙子不说，还要千方百计省下粮票，接济儿子，用张先痴的说法，她把儿子一直养到出狱时的四十六岁。在为子孙耗尽了一切以后，她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最后撒手而去。张先痴深含内疚地这样总结母亲的一生：“从四十岁开始，直到九十二岁去世，整整守寡五十二年，其间母亲亲手带大的儿女和孙辈不下二十个”，“全靠那颗宽厚善良的心”，支撑了自己，也支撑了全家。张先痴在囚居中曾噙着热泪写过一首写给母亲的长诗，其中的一句是：“她手上有永远也织不完的毛线团，脚盆里堆着永远也洗不完的脏衣服”。我由此想起自己对母亲的永恒记忆，也是“端坐在藤椅里，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我说：“我愿意永远俯首于这幅圣母图前”（《这也是一种坚韧和伟大——先母逝世二十周年祭》）。这“圣母图”是属于生活在“格拉古梦魇”里的这一代人的，她是我们的无尽苦难中的心灵的慰藉。

成为心灵慰藉的，还有妻子。这也是我们阅读、讨论这本书不能不提到的“我的妻子”这段回忆。张先痴说：“我之所以能活到八十多岁的今天，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这位贤惠，善良，聪明的妻子杨文婷”，“她就像我的保护神”，“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一切”。这大概也是所有的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共同的遭遇和生命体验。我在关于“格拉古”时代里，那些受害者何以生存下来的讨论里，特意谈到“女性”的力量和保护神作用：“对女性——妻子、母亲与儿女的思念与爱，成为被剥夺了一切以后，唯一夺不走的東西，成为这些

一无所有的受难者保持人性的自觉的最后的支撑，成为他们与非人化的罪恶相对抗的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可以说，有女性存在，哪怕是思念、梦幻中的女性存在，这些男子汉就不会被革命地狱所压垮”，“这真是地狱里的生命的最强音”（《地狱里的歌声》）。

我们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步：女性的力量在哪里？在我看来，这主要是人性的力量：女性是人性的真、善、美的集中体现。于是，就注意到，在张先痴的苦难记忆里，始终有一些“好人”存在，本书的叙述里，除了母亲、妻子，也还有许多关于同学、难友的美好回忆。如他自己在《格拉古轶事》里所说，“支撑受难者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好人的存在。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善良光芒，其魅力无穷无尽”。我在评论中也强调：“这人的天性，人的良知，是任何力量与体制也‘网’不住的”，这也是我们走出“格拉古梦魇”的希望：“人还在，而人将是最后的胜利者”。（《一个人的命运及其背后的社会体制的整体运动》）。在我看来，这就是张先痴先生“格拉古三部曲”苦难记忆背后的潜在主题。■

2017年3月7日—9日

【述 往】

上海交大的第一张大字报

吴美潮

读了蔡家麒的《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8期）及《对〈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的质疑和辩疑》（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0期）后，深深觉得我有历史责任应把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来龙去脉回忆公布，以免将来引出麻烦。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有幸刊于2006年第1期的《北京大学校友通讯》上。

1957年6月13日下午，在上海交通大学徐家汇本部的学生第8宿舍201室，即作者蜗居处，除了本宿舍的几人外，还来了几位外宿舍的同班同学。大家对交大院系调整和迁校等有些看法，商讨是否应写张大字报？一致同意要写，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提供口头草稿，并公推由我执笔，同班同学姜震元进行润笔补充，据说最后一句为过军先同学所拟，由书法最好的庄天戈同学抄写到大纸上，黄子光同学（已故）自告奋勇拿到容闳堂（总办公厅）北门口张贴。这是上海交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它的全文为：

追溯历史良伤感，展望未来当努力

“理工一家”本是交大优良传统，却被院系调整机械割立，好不痛心。

“人材济济”原为我校雄厚基础，苦为宗派主义东调西迁，大损元气。

“汽车”开往长春，然，“清华汽车”原封不动。

“电讯”拍到成都，而，“南工电讯”屹然兀立。

造船工程系独立，如折一臂。

南洋机电院另建，更无必要。

痛哉！领导之软弱。

惜哉！母校之支离也。

亲爱的同学：破官僚主义必须坚决斗争，怕啥静默无言？

尊敬的党委！行上级指示理应独立思考，因何惟命是从。

团结一致，挽巨星之将陨！

万众一心，振欣欣以向荣！

电器四一群护校者

57. 6. 13

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读者颇众。继之，各种大字报风起云涌、铺天盖地而来。甚至贴到了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的小轿车上，当时杨部长为处理交大迁校而长驻交大。1957年7月，反右派运动开始，我和姜震元均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

有人认为，一张小小的大字报，打破了‘静默无言’，掀起了‘护校’鸣放高潮，保住了在上海的‘交通大学’这块神圣的金字招牌。 ■

【文摘】

“57 右派”已成为极高的荣誉¹

林培瑞 / Perry Link

中国文化中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觉得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起了“关键”作用？从这一次会议的论文和发言题目来看，好像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我也有。但究竟为什么？“关键”的感觉从哪里来？

反右以前，中国已经经历过土改、镇反、肃反，都是血淋淋的事情，够残酷的了。反右以后还更可怕。文革受迫害的人数要比反右多好几倍。最可怕的数字当然是“大跃进”的大飢荒的；那三年的死亡率至少要比反右多一百倍。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么“关键”？

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我觉得从“百花齐放”的揭露真相过渡到“大

¹ 此文是作者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跃进”的谎言就是这么个过程。

刘宾雁先生生前曾经告诉过我，他划右派以前很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语言，被划成右派以后，虽然不能接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说法，但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我可能真的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不可能不对。”在这一点上，我想宾雁先生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划了右派以后，宾雁去跟中国的最穷的老百姓一块住了几年，经过了一个在一辈子有决定性的转折，这也能算“语言变化”：他发现中国社会上有“两种真理”。宣传部的官方真理在报纸上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传达下来；同时有另一种真理，是由老百姓的艰难生活长出来的，从下往上。两种“真理”之间似乎毫无关系。两者之间，宾雁决定要接受后者。

我个人觉得这种“语言分野”是一个关键和要命的问题。以前，在土改、镇反和肃反的时候，虽然残酷，但理想语言还是有“能够信”的可能性。运动的参与者还是能对自己说“我是为了理想……”。但以后，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

我以为这个深刻的变化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犬儒主义”：说假话，造假货，卖假药，说一套做一套，等等。这个浪潮的出现当然跟后来邓江胡时代的“不讲政治，只向钱看”的政策有关。但是1957以后的“语言分野”和“两种真理”的作用显然是关键。

帽子的变化：从“反党”到“反华”

今天想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从57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帽子”的变化是什么？当时“右派”的正式罪名叫“反党反社会主义”。把这个模式带到今天来看，非常有趣。今天的中南海不提“反党”两个字，这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公开承认真的有人反党。同时也不提“反社会主义”了，这大概是因为自己放弃了社会主义。太子党捞鱼的经济池子里，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野蛮的资本主义，要是现在埋怨别人反对“社会主义”免不了带来一

点自嘲的味道。

中南海现在不喜欢你，说你“反”什么呢？有时候还用“反动”两个字，但更有趣的是说你“反华”。把原来的“反党”扩大到“反华”，又是为什么呢？显然是为了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共产党把自己说成民族尊严的代表。在国际上，只要是对中国政府有批评的人，那就自然属于“反华人士”。国内的中国人，虽然是公民，一旦跟“不怀好意的国际势力”挂钩，那也算染上了“反华色彩”。今天与会的中国朋友，在中南海看来，恐怕已经有点“反华”了吧？

我对这个问题有点敏感是因为我自己也被戴上了“反华”的帽子。林培瑞花了一辈子研究中国文化，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是中国人，这都不要紧。在中共的语言里，林也是“反华”的。

我们这个会议的目标之一应该是对中南海，乃至全世界，说清楚：对不起，我们不反华，而且我们要求进一步地问：在最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上，到底是谁在名副其实地反华？到底是谁害了中国？

谁带来了世界破纪录的大饥荒？谁制造了“两种真理”？谁把说假话，造假货，卖假药，自欺欺人的犬儒主义带给了中国人？这些都是老百姓一手创造出来的吗？还是责任在中南海？

到底谁反华：毛泽东反华还是刘宾雁反华？丁子霖反华还是杀他的儿子的人反华？是中国民主党反华还是中国太子党反华？是罗干反华还是在座的几位在出国开这个会以前必须跟国安警察“谈话”的人反华？到底谁代表中国文明的利益？

在我看来，“右派”早不是个帽子，不是贬义辞，而是极高的荣誉。■

【文摘】

《五十年後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前言

丁抒

1957年夏季，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镇压言论自由的政治运动。运动采取卑鄙的诱骗方式，宣称“言者无罪”，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而后将其定为“右派分子”，使百万人沦为“专政对象”家破人亡。这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也是一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远为酷烈的运动。中国科学院科学史专家许良英指出，当代中国有四大灾难：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而综观四次大灾难，后面三次都与第一次反右有因果关系。要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反右运动是关键。

对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曾这样作总结：“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在1956年，我看实际是在1957年。”¹“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²“1957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³

这个“胜仗”使毛泽东获得了历代统治者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得以按照他的意志去改造中国。用他的话说，在中国这“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反右之后，他送给中国人民的第一件作品，便是“大跃进运动”，其直接后果是三千余万人死于饥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他的第二件作品就是那号称“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

当年被毛泽东点名而成为“右派分子”的诗人流沙河说：“如果1957年不搞这个反右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651页。

² 1959.7.31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的讲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996）第182页。

³ 1959.8.11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96页。

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若敢那样搞，就会有更多知识分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¹。1957年被毛泽东点名而成为“极右分子”的李慎之先生也认为，反右派运动直接孕育了大跃进。大跃进的失败则导致了1959年初的反右倾斗争，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如原上海《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所说：“从那次“阳谋”后，知识分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这大概是“杀鸡儆猴”的战略部署吧。这次“阳谋”的如愿以偿，为以后的“史无前例”作了准备。”²

2007年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6月29至30日，由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和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洛杉矶举行。本书即该会议的论文专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与会的一些学者提交的论文也收入在内。此外，编者还采用了已经故去的李慎之和刘宾雁先生的两篇文章。

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丛书主编宋永毅先生为本书的中英文署名和分类标题等撰写了不少的心血，张成觉先生参与了对全书的校对，仅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五十年后重评“反右”

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纪念“反右”五十周年	许良英
从一九五七到二〇〇七	邵燕祥
“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	杜 光
审视反右五十年	郭罗基
纪念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五十周年	陈奉孝

¹ 《曾经沧海身犹在 —— 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² 徐铸成《阳谋亲历记》，《中国之春》纽约，1987年12月号第30页。

1957：中国当代史大逆转

刘宾雁

“反右运动”前前后后

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

吴国光

从八大的悬案看整风到反右的“转向”

齐 戈

“引蛇出洞”考

李慎之

论“阳谋”

丁 抒

驳“反右必要”说

张成觉

“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

叶永烈

评析右派三大理论

叶永烈

“反右派斗争”镇压和扼杀了“五七民主运动”

姚监复

反右运动中派发了一百八十万顶“帽子”

丁 抒

国际风云下的一九五七

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一九五七年和我 方励之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

——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

程映虹

试探一九五七年中共国际关系与整风转向之间的关联

张轶东

“反右”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意识形态的兴衰与知识分子的起落

陈 彦

1957：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

朱 正

中共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高 瑜

从罗隆基看中国自由派在一九五七年的命运

陈奎德

从“一边倒”看毛与民主个人主义者 戴 晴
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变迁 章立凡

“反右”和大陆民间思潮的承传

从北大一角看“反右” 陈斯骏
抵抗极权的民间杂志——《广场》 邵 江
1956-1966 中国大陆民间思潮个案研究 钱理群

一个人的遭遇和一个历史时代

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 徐 贲
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 胡 平
我所知道的“反右斗争”和“右派份子” 朱学渊
沙文汉的政治民主诉求及对中国社会特点之探讨 沙尚之
一部个人档案和一个历史时代 杜 高
一个归国华侨的右派经历 叶国荣
“九死一生”话反右 巫宁坤
我们这些小右派 巫一毛
曾经沧海身犹在——口述“草木篇诗案” 流沙河
我的右派生涯 龚定国

史料学和“一九五七年学”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与评价 谢 泳
关于建立“一九五七年学”的思考 钱理群
“一九五七年学”方法谈 魏紫丹

【文摘】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节选）

——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

程映虹

1956和1957年的“非斯大林化”标志着冷战时期全球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其间发生了很多重要事件。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在很多国家导致对共产党体制的挑战，特别突出的挑战是1956年底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他东欧国家虽然基本上未发生由政治抗议引发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但党内辩论和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还是非常普遍，同时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在亚洲，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的批评——尤其是在1957年春天的“整风运动”中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在北越，知识分子直接向党国体制挑战，在1956年秋发起了“《人文》、《佳品》”运动，同时北越义安省农民发动了反抗越共“土改”和整个农村政策的武装暴动，在城市也发生工人和学生的骚乱。

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11月，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整个苏联东欧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在中国，中共继续允许知识分子批评政府，这不但给苏联造成了压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东欧党内改革派发出自己的声音。“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北越政府镇压了义安省的农民暴动，用取缔报刊和发起批判压制了知识分子的异议；但到了1957年春，随着中共对知识分子批评的宽容和鼓励，越共的“反自由化”运动失去了势头，越南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对党的批评；直到1957年初秋，越共尾随中共发起了大规模“反右斗争”，结束了所谓的“自由化”。在东欧，中共的“反右”

给了东欧一些党内改革派势力最后一击，“匈牙利事件”后残存的改革派人士最终在1958年初被清除，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危机至此告终。

迄今为止，有关“反右”的研究基本以中国国内政治为主要背景，本文选择一个不同的角度，把中共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放到国际共运的大环境中观察，着重分析1956年至1957年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由此可以发现，中共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之决策，不仅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而且与中共的国际目标有重大关系；“双百方针”的提出，不单纯是为了“引蛇出洞”，也是中共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争夺领导地位的举措。如此才能充分认识“反右”运动的由来和毛主义的实质。

一、“莫斯科中心论”和“中国联系”

在叙述和分析“非斯大林化”或自由化运动时，人们常遵循“莫斯科中心论”。在这个模式的叙述中，处于边缘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反应是震惊和困惑，但很快一些国家的党内外人士就利用这个机会发出那些通常不被允许的改革之声，由此出现了一场自由化运动。考虑到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先后顺序，“莫斯科中心论”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但有必要注意“莫斯科中心论”的一些盲点，其主要缺陷是，忽视和低估了那些并非起源于莫斯科的政治变化，这常常导致对一些复杂历史事件和对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理解的简单化。

“莫斯科中心论”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它强调在这场自由化运动当中受到挑战的主要是“斯大林模式”，却忽视了“毛泽东模式”实际上同样受到了挑战。在中国和北越，“土改”、“镇反”、“整风”、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文学艺术创作的严酷控制，这些相似的政策与其说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发明创造。这些做法通过思想、组织和人事方面的渠道至少对北越的共产党革命产生了重大影

响。1956年到1957年期间，这些毛主义的产物不但在中国“右派”的言论中，而且也在北越知识分子中受到了挑战。

今天回顾20世纪的国际共运史时很多人以为：“斯大林模式”（以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党内清洗等为代表的建立极权主义体制的道路）在50年代中期受到了清算；而毛主义（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用“不断革命”来巩固和发展极权体制）的被批判始于70年代末，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引导着人们开始否定毛主义，但毛主义关于“民主革命”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很多政策还是“符合实际”的。这就是所谓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之区别，也是其个人功过“三七开”的主要根据。然而，回顾1956年到1957年的历史，在国际共运阵营清算“斯大林模式”的同时，这个被“七分肯定”的毛主义实际上也受到了批判，尽管在程度和影响上与苏联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还不可同日而语。

本文从中共与北越党和一些东欧党的关系（中国联系）出发，考察共产党国家在50年代中期由“非斯大林化”引发的自由化，并强调“中国模式”或毛主义在这场政治巨变中的作用。这是一个至今被“莫斯科中心论”所忽视或低估的问题，即使是在信息自由的西方学术界也是如此。

“中国联系”的内容非常复杂，它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共的“土改”、“镇反”、“整风”，以及经过“延安整风”形成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这些对北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结果是北越在1956年到1957年间的“自由化”实际上不是反斯大林主义，而是针对这些毛主义的产物。但毛主义的这个侧面在东欧国家基本上未产生重要影响。第二方面是中共当时的“双百方针”，从1956年初到“反右”前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些政策客观上是对此前很多政策的修正，具有明显的“解冻”或“自由化”倾向，在实践中不但鼓励了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启发、鼓励了东欧和北越党内的改革派和异议知识分子的活动。东欧把毛主义和“中共模式”的这个方面借用来作为对抗斯大林主义和苏共强权的意识形态武器。而在北越，

异议知识分子则用毛主义和“中共模式”的这后一方面来对抗其前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看，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后继续发挥着影响，直到中共发动“反右”运动为止。第三方面是毛主义和“中共模式”对其它国家共产党处理危机的方式之影响，包括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的国外应用以及对自由化运动最终的镇压。中共的“反右”给了东欧和北越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派以最后和致命的一击，从而宣告了斯大林死后共产党阵营内自由化运动的终结。

应该指出，毛主义或“中国模式”的这三个方面在具体政策倾向上虽然有重大甚至原则性差别，但在两个根本点是相互联系且完全一致的。其一，在国内它们都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这个目标，不同的仅仅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中共建政之初，还处于体制上的摸索阶段，尤其是在处理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上更是如此，因此在一定阶段内表现出灵活性。那也是毛泽东掌权的26年中唯一的一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上表现出灵活性的时期；其二，在国际上，它们都服务于在国际共运中推广“中国模式”和树立毛主义的地位这个总方针。在斯大林去世并受到批判、苏共领导地位受到“二十大”正反面影响的冲击的形势下，中共企图通过推广自己的模式来扩大它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甚至和苏共平起平坐。

本文讨论的“中国联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共和东欧(一定程度上苏联也包括在内)从1955年到1958年初的关系；其二是中共和越共在相同历史时段内的关系。通过分析“中国联系”，不但可以看到一个“莫斯科中心论”无法解释的共产党国家政治变化的源头，而且可加深认识那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进一步扩展分析的时间范围，比如，有必要将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之前和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之后的诸多事件也纳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越南知识分子的抗争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政治抗议模式：波匈是有工人和市民大规模参与的政治暴力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政权更替成为公开诉求，知识分子最终被边缘化；而中越始终以知识分子的抗争为主，争取言论自由始终是主要诉求。

二、“双百”方针对东欧的影响及中共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略)

三、“中国影响”在北越

与对东欧的影响相比，中共对越南的影响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里，能看到的材料也丰富得多。如果说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始于斯大林死后，而且受到苏联影响的限制，那么中共和越共之间历史上的关系要密切得多，甚至可以追述到20年代。

1. 中共和北越共产党的紧密关系

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共产主义者曾经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加入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抗战结束后，很多加入中共的越南共产党人和军人回到越南北部，开展了抗法斗争。1949年中共革命的胜利为越南革命提供了直接支持，中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顾问和物资，中共革命的模式对越共也有深刻影响。1951年3月的越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方针，毛的像片也与马恩列斯并列；“中国模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被确定为越南当时和未来的革命目标，“民族统一战线”也被称为动员各种力量——尤其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手段。此外，历史上越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典籍一直是越南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使用中文的能力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文化教养的标志。因此，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可以从中文材料中了解外部尤其是北方邻国的情况。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北越的“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与中共的关联远比与苏共的关联密切。东欧国家当时照搬“斯大林模式”造成的主要问题是过度强调重工业，缺乏日用品和农产品，斯大林时期党内清洗留下的案件和积怨，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最重要的是莫斯科的太上皇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给东欧国家带来种种严重问题的同时，对自己的模式在北越所造成的问题从来讳莫如深。在中共正式公布或间接透

露的有关中越关系的文件资料中，充斥着中共如何在军事、经济、外交和人员上对北越的援助，但闭口不谈北越在 50 年代上半期如何照搬中共的“土改”、“思想改造”（“延安整风”）以及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这三大政策，给北越社会带来严重破坏的情况。

2.中共农村政策在北越的影响

北越在 1946 年到 1953 年的抗法战争期间，对其控制区的地主富农基本上是实行“减租减息”，同时没收法国地主和依附法国殖民当局的越南地主的土地，这是中共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翻版。早在 1949 年，中共就开始催促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实行“土改”，但胡志明和其他一些越共领导人以越南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为由拖延抵制。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因此认为胡志明不愿按中共模式实行“土改”，在农村阶级斗争问题上表现暧昧。刘少奇在 1963 年一次反修正主义的内部报告中，以“老子党”自居，指名道姓地说，胡志明“这位同志历来右倾。我们建议搞土改，他不搞……后来把他搞到莫斯科去，我跟斯大林一说，斯大林把他臭骂一顿。他才下决心搞土改”。刘少奇提到的胡志明的那次莫斯科之行发生在 1949 年 7 月。

从 1953 年开始，随着对法战争的节节胜利，北越党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开展了“土地改革”。当时北越党关于“土改”的宣传提纲中特别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在抗战时期（即民族革命）一直坚持了“减租减息”，而现在北越也还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仍在和法国殖民军作战），为什么却要实行中国在下一个阶段才实行的“土改呢”？越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中国当时由延安和重庆两个政权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者代表地主利益；而北越的情况不是这样，除了法国殖民者就是在西贡的保大傀儡政权，所以实行“土改”是有条件的。换言之，在北越，无人保护地主的利益，所以即使在“民族革命”时期也可以将他们打倒。

中共的顾问参加和指导了北越很多地方的“土改”，介绍了中共“土改”中“斗地主”的经验，比如在农村里划分阶级、用各种手段煽动对“地富”的仇恨、甚至用地痞和流氓

充当打手等。越共干部在参加“土改”前都必须专门学习中共的“土改”政策和经验。直接领导这次“土改”的长征从1941年起就担任总书记，在越共领导人中地位仅次于胡志明。他受中共影响很深，不但把“土改”看成是在越南照搬“中国模式”的最重要部分，而且看成他对北越革命最大的贡献，甚至有时把派往地方的“土改”工作队称为“我的”干部。

在全面“土改”之前，北越劳动党于1953年春节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土改”铺平道路。这场运动以北越党中央的一道命令开始，名义上是打击那些没按照规定交纳农业和商业税的富户，但实际上几乎波及全体农民。运动开始后，干部组成工作组，带着棍棒、绳索和武器下乡，对那些未完成上交税收的农民严刑逼问，强迫他们交代逃税的后台和同伙，以及逃税的政治目的。使用的刑法包括在头颈上吊石块，用绳索拴住手或脚吊起来等等。这场运动很快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卷进去成为受害者。后来运动失控了，逃税与否已不再受到关注，揪出反革命和镇压反革命成了主要口号。在很多地方，工作组和党的干部都只在幕后操纵，甚至原先被依靠的“贫苦农民”也遭到排斥，前台则由乡村的破落户和痞子主导。恐怖笼罩了越北农村，很多党员干部由于其家庭背景和对运动的抵制也成为牺牲品，甚至一个回乡探亲的北越政府部长也被当作逃税户而关押，结果夫妇双双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当时有数万人被关押，直到1956年北越党被迫“纠错”时才被释放。

越北农村的这场恐怖延续了两个星期，有研究者认为，平均每个村有4到5人死亡。1953年2月底胡志明发表了讲话，对两个星期来农村运动的失控表示遗憾，向农民道歉，但并未否定整个运动。“群众的义愤”和“群众自发的行动”被党用来为恐怖和暴力辩护，“群众永远是正确的”、“群众可以自己领导自己”等口号也被用来在原则上肯定这场运动。这些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观点。党取得对农村基层的控制权后，收集了那些抵制运动、参加运动不力或企图保护自己在农村的亲戚的党员干部名单，然后把他们全部送进“再教育营”，直到1956年夏天才在“纠错”运动中和那些被

捕者一起释放。这场“反逃税”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在北越农村造成了恐怖气氛和对党的绝对服从，为几个月后“土改”的全面展开铺平了道路。

北越的“土改”从1953年底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开始，到1956年底结束。在这场“土改”中，大量中农和富农被划为“地主”而受到打击，甚至被送上“人民法庭”乃至枪决。同时，越共还对“土改”对象的家属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不允许这些家属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导致大批妇女儿童在家中饿死。这实际上是党的“消灭地富”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党内，很多反对这种“土改”政策的原“老区”党员干部受到积极贯彻新政策的外来干部的打击、惩处甚至杀害。

3.北越的“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

“整风”的越南文发音为 Chinh Huan。北越“整风”的历史背景和中共的“延安整风”类似，都是对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不信任，要从改造人性入手建立高度统一的极权政党。很多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北越共产党人回国后，把他们在中共那里学到的经验介绍过去。这场针对党内外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整风”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是毛泽东“延安整风”的翻版。按照台湾学者陈永发对50年代早期中共思想改造政策的简明概括，“中共的思想改造主要籍由两个方式：一是邀请知识分子参加土地革命，一是成立各种学习班或办理各种政治学习”。这两个方式在北越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都被采用。

从1951年开始，“整风”运动在越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延续了几年。这两场运动波及北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在武装和地下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对党的政治忠诚的知识分子，也被强迫送进与外界隔离的学习班和特殊学校，经受系统的强化的思想改造。很多人不堪忍受压力和折磨而自杀，所以后来连剃须刀都被没收，在电力紧张的情况下，“思想改造学习班”的灯火昼夜通明，对被改造者严加监视。从1953年到1956年，大批北越知识分子被安排参加“土改”工作队，参与了农村人口“成分”调查、政策宣传和撰写通讯报导等工作，要求他们在此过程中既改造农村，也改造自己。

很多中国读者都知道，有一个叫洪水(原名阮山)的北越共产党人，参加过中共的长征和“延安整风”，曾任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他1948年回到北越，以少将军衔担任第四军区司令。他根据参加“延安整风”和解放战争期间“整军”的经验写了小册子，建议越共实行“三整”(整党、整干、整军)。由于洪水主张毛式“自力更生”，在军事方针和争取中共援助上与胡志明、武元甲等北越党、军领导人有矛盾，洪水后来回到了中国，他的“整风”建议没有马上在北越实行。但1951年以后，越共在中共顾问的参与下还是发起了“整风”运动。洪水的建议说明，中共“延安整风”模式在北越党政干部中早就产生了影响并形成了接受这种模式的土壤。

中共对越共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北越的“整风”中大量使用了中共的“整风”文献，而且“延安整风”与后来越共政治运动中采用的很多做法也有其越南版本。例如“硬戴帽子”，即不管受审查者如何否认，他必须承认他从未犯过的罪行，丝毫没有自我辩护的机会；还有“车轮战”，即连续多个昼夜对受审查者进行盘根究底的逼问，涉及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受审者心理崩溃。北越“整风”中的另一个常用手段是“连环套”式的追究“反革命”动机。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教师被怀疑为“反革命”，于是他的学生对他使用了这种方法，将他定为“反革命”。其过程是：你给了某学生一个他不应得的高分，我们就此认为：一，你以此在我们之间制造矛盾；二，有了这种矛盾学生就相互争吵；三，他们从此就不再进步；四，他们甚至会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不如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学校；五，他们会进而认为今不如昔，现在的整个制度不如法国殖民时期；六，所以用一个不符合实际的成绩，你就达到了为殖民统治者服务的目的；七，可以得出结论，你就是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中共的“思想改造”中，认“罪”者常常在公开场合痛哭流涕表示自己的悔“罪”；在北越，这种方式演变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悔罪和施加压力的手段。在“思想改造”会议上，听取“悔罪”者认罪的人常常集体痛哭流涕，表示他们没有听从“胡伯伯”和“毛伯伯”的教导，让这个人犯了罪；或者是集体到一个还拒绝认“罪”的人那里，在他的门口大声

哭泣，用这种方法逼他就范。这种方法在很多地方，尤其是集中了未成年“思想改造”对象的学校里，造成精神失常。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北越只不过是受中共“延安整风”模式影响的一个事例。马来西亚共产党在60年代也曾多次发动“整风”，让党员轮流去“学习班”，由一些从中国回来的干部介绍“整风”经验。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自由主义”等被作为马共的“整风”文献，每个人都要“活学活用，敢于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的肮脏卑鄙思想挖出来消毒，让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马共内部在60年代末还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情形，大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被杀害。马共1989年放弃武装斗争重返社会时，大量受害者的家属前往马共营区追寻亲人下落，马共不得不专门发出文件，为这些受害者“平反”，追认其为“烈士”，并给每个受害者家属800美元的赔偿。

4. 北越对知识分子的管理控制

和中国一样，北越共产党的革命吸引了大量怀抱民族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艺术家，他们在民族主义革命中非常活跃。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找到第三条道路的话，越南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因为越南除了法国殖民当局就是保大傀儡政权，而中国毕竟还有一个独立的国民党民族主义政权在与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还有大量的城市供独立知识分子活动。而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越南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除了北越共产党以外没有别的政治势力可以选择，除了前往北越根据地以外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他们作为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生存。这些抵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抵抗知识分子”，很多人长期在森林中生活，与“越盟”（越共在抗法时期的名称）的干部战士一样落下了一身疾病。

如果说中共在革命中曾面临如何改造大量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北越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其实对以毛主义为模式建立的北越政权有反感，但在民族主义的两难处境中他们往往选择了前往北方、加入革命。北越50年代中期“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潘魁曾对这种两难处境和无可奈何的选择有过一个比喻。他招待客人喝咖啡时，

由于“越盟”控制的越南北部地区没有可以直接融于咖啡的白糖，潘魁就让客人嚼一些土产粗糖。他说：“这些土产粗糖代表爱国主义，它可以冲淡咖啡的苦味，而这种苦味就象党的领导。有了这种土产粗糖，我们就可以在忍受咖啡苦味的同时欣赏它的芬芳，因为这种芬芳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尊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比作越共的“小老婆”，其含意是，不论你如何忠心耿耿，越共也永远不会“明媒正娶”，改变你的“身份”。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忍受不了“越盟”的控制和改造，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离开越南北方的“越盟”控制区，回到了越南南方。

为了控制和改造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北越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所有参加反法民族主义斗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归北越军队的总政治部管辖(北越政府一直到1955年2月才建立起文化部)，接受军事纪律的制裁。北越军队总政治部完全是仿照中共军队的模式建立的，很多越共军队政治干部在中共军队中受过训练，受党的委派监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的工作。在总政治部下有一个军队文艺工作处负责具体事务。北越也有模仿中共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联盟(文联)，但其权威无法和军队总政治部对文艺的控制相比。当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甚至就住在军营里，受军事纪律的约束，外出要象士兵一样向上级申请离营证，社交对象也要由军队党组织批准。

在文艺思想上，与毛泽东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统一党的文艺方针一样，北越也把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创作严格限制在为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范围。北越党的主席胡志明提出了“文化抗战化、抗战文化化”的口号，把文化完全看作是抗战的一条战线。北越党的总书记长征在1948年7月的第二届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和越南文化”的报告。他明确指出，西方文化中为艺术而艺术的腐朽倾向在北越革命中是不允许的，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这个报告后来成为北越文化工作的指南。北越党也有一个类似于中共文艺领导人周扬的角色，即中央委员、诗人素友(To Huu)，他在1949年就提出，必须从文化领域中彻底清除旧社会的全部遗迹，要让艺术与政治结合，让作品的政治内容

决定艺术形式，文艺工作者必须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创作。在越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文艺家都首当其冲。

5.北越知识分子的异议思潮

和中国一样，正是在这些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产党体制下最初的异议思潮。法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使越南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人权观念，就像世界近代史上很多非西方民族从殖民统治下了解并接受这些思想一样。而中国儒家人文主义和精英文化的熏陶，使他们难以接受共产党革命中的暴力和粗俗。越南知识分子对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历史非常熟悉。越共也利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比中共在抗战结束前后对美国制度的赞美有过之无不及。抗日战争结束前，胡志明和武元甲等人不但热情接待空降到越北游击区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表示未来的越南要和美国建立亲密关系，而且多次向美国国务院发电报，表示越共的运动完全是民族民主性质的。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的“越南独立宣言”中，第一段就完全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二段，即那些“不言而喻”的基本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人民主权)，并称这些是“不朽的原则”。胡志明还引用了“法国人权宣言”中的一段。《越南独立宣言》的主要部分列举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如何公然无视这些普世性原则，践踏越南的人权和民族权利。如果把这些段落与“美国独立宣言”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在结构上几乎是对称的，语言上也十分相近。不但如此，“越南独立宣言”的结尾和“美国独立宣言”也几乎完全相同。胡志明和“越盟”如此做的政治目的是向美国表示，越共的革命是受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的鼓舞，并非共产党革命，从而希望美国能支持他们在日本战败后防止法国殖民统治卷土重来。

据 Kim N. B. Ninh 的研究，北越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早在 40 年代末就开始了，但一直没有凸显出来。北越共产党 1954 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结束了武装斗争，进入城市，并建立了国家政权。城市生活助长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情绪。恰逢“非斯大林化”浪潮

在各共产党国家蔓延，北越知识分子从1955年2月开始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时，军队中大约30名作家和艺术家联名向中央委员会上书，要求废除军队总政治部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这份上书的内容包括：“一，把对艺术和文学的领导权还给艺术家和文学家；二，在军队组织范围内建立作家和艺术家协会；三，废除现存的对文艺工作的军事化管理。”领导这场上书运动的是年轻诗人和小说家陈寅。参加上书的有诗人黄琴（当时是越军总政治部文艺部的营级干部）、音乐家子朴等。在上书的同时，陈寅带领大约20名文艺家面见军队总政治部主任阮志清，提出3项保障艺术创作自由的要求。阮志清拒绝了这次请愿，当面斥责这些人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这些知识分子本来以为他们参加革命的经历已经使党相信自己的忠诚，这次请愿的失败使他们大受挫折，为以后向党发出更激烈的挑战埋下了伏笔。

陈寅领导的上书和请愿是斯大林死后共产党国家中文艺领域“解冻”呼声的一部分。这种呼声政治上要求放松对文学艺术家的控制，艺术上要求解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只准从正面表现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统治）的束缚，是知识界自由化运动的先声。一些北越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研究者认为：陈寅的活动与中国的“胡风事件”有关；当胡风对中共文艺界领导人提出挑战时，陈寅正由越军总政治部派往中国，撰写反映“奠边府大捷”的剧本，他在中国期间无疑对当时中国文艺界人士中议论纷纷的胡风观点有相当了解。和大多数参加革命的越南年轻知识分子一样，陈寅是在对日抗战结束时参加革命并开始创作活动的，1948年入党。在40年代下半期，他就表现出反对官方文艺政策——即胡风所反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塑造模式化英雄人物的倾向。陈寅1951年参加过“整风”，是北越文化界中最早的一批接受中共“整风”方法的人，他对毛主义的一套和中共文化艺术界的情况非常熟悉，在北越文艺界同侪中有“中国大师”之称。陈寅和胡风在文艺思想和对官方文艺权威的态度方面非常相似，可以说是在相同的政治控制和文艺政策下一对孪生的异议分子。他1954年前往中国时，越共按惯例由总政治部派一位政工干部伴随陈寅，对他的创作活动横加干预，陈寅不久就与这位干部发生冲突。回国后在发起向阮志清请愿的

同时，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前仆后继”，他没有按照官方教条把战士的形像拔高，而是尽量使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和讽刺了越共文艺界权威人物、越共中央委员素友新出版的一本诗集。官方认为素友的这本书贯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艺创作的样板。而陈寅在他的文章中不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接提出质疑，而且提出了“百家”的概念。他批判党的文艺机构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下规定写什么和怎么写：“为什么没有人去写政府机构？为什么没有人去表现爱情？为什么只准写工人农民出身的人物？现实主义应该鼓励形式和内容上的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作为学术研究上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1953年应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的要求，就郭沫若和范文澜之间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争论所写的题词。这个说法不久就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后来又成了“双百”政策的一部分。陈寅关于“百家争鸣”的提法是否与他在中国的经历有关？作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知识分子，他有可能知道“百家争鸣”的典故。但更可能是他不久前在中国时对这个原则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受到鼓舞。

陈寅的上述言行可以看成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越南知识分子的大胆发泄。研究越南1950到1960年代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Ninh指出：“很明显，中国进行的对胡风集团的猛烈批判提高了越南党的警觉。”随着中共开展“反胡风”运动，1955年5月，陈寅被北越共产党“劝告”退党。1956年初，他又被送进“土改”工作队强化“思想改造”。不久，胡风被中共逮捕，1956年2月越共也逮捕了陈寅。一个参与决定逮捕陈寅的越共高级干部认为：“中国有一个胡风，我们很可能也有一个”。在北越1956年9月30日出版的《人文》杂志上，刊登了一幅讽刺党的文艺界领导在越南抓“胡风”的政治漫画。这幅漫画的画面上，越共管理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怀青左手拿着胡风的书，右手把拿着反映“奠边府大捷”作品的陈寅当胸抓住。漫画里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怀青说，“同志们，这就是胡风本人！”陈寅说，“亲爱的同志和领导，我发誓我的名字叫陈寅。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去查我的出生证明。”

6. “非斯大林化”和“双百”方针在北越引起的反响

陈寅被捕后不久，苏共在1956年2月举行了“二十大”，4月派遣米高扬去北京和河内通报“非斯大林化”的新政策。苏共的变化给越共带来了震动，它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米高扬访问河内后，越共以逮捕陈寅的决定未经高层批准为由将他释放（陈寅曾经在狱中自杀未遂）。5月，中共宣布实行“双百方针”，这立即激起了北越知识分子的共鸣。著名哲学家、新建的越南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德草立即安排人翻译了陆定一的讲话，准备在北越发表。陈德草在法国获得学位，用法文出版过研究现象学的著作，在西方哲学界很有影响。他于50年代初放弃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回到越南，参加了越共领导的反法斗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了表示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缩短与参加过武装斗争的越共成员的距离，陈德草曾故意不用蚊帐睡在森林里，让蚊虫叮咬，患上了疟疾，这是很多游击队员的常见病，几乎成了参加革命的标志。

据 Bernard B. Fall 的研究，北越党最初力图限制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和中共“双百方针”的影响，但北越知识分子不久就冲破了上层的限制，引发了1956年夏秋的意见浪潮。在自由化运动的初期，北越知识分子主要是讨论创作自由以及党对文艺的领导，但也涉及其他问题。8月1日到18日，越共被迫让文艺工作者举行了“第一届越南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北越原有中国模式的“文联”，但从未开过代表大会），议题是学习苏共“二十大”文件和中共的新文化政策，结果会议通过了要求党中央修改文艺政策的5项要求，包括立即翻译中共有关“百花齐放”政策的文件。1956年7月底8月初，河内市议会举行会议时，与会代表也对越共各方面的政策（从食品短缺到税收）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国际国内形势下，越共被迫就40年代末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作总结和反省，于1956年8月底宣布采用新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新政策是：“一，最广泛地团结和动员知识分子的力量，完成新时期的革命任务；二，根据知识分子的能力使用他们并信任他们；三，在国家能够承担的基础上，保证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给予他们应得的报酬；四，继续帮

助旧知识分子了解革命思想，训练新知识分子，不断地扩展他们的知识，扩充他们的队伍。”在主要内容甚至措辞上，越共的这些政策与同期中共的政策惊人地相似。周恩来在1956年1月所作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曾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前的问题不是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信任，而是如何合理地充分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如何向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如何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保障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周恩来的报告在北越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中有相当影响。越共中央党校的编译机构1956年11月翻译了周恩来报告以及陆定一关于“双百方针”报告，供内部传阅。由于很多越南知识分子都能直接阅读中文，所以中共文献在北越知识分子中的实际流传要早于越南文本的出版。

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越共派人前往中国考察“百花齐放”。到1956年秋天，随着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激化，共产党国家的异议浪潮不断高涨，越共中央开始全面修正政治经济政策，于9月初召开了“十中全会”，由于争论激烈，会议一直开到10月底。党中央于10月29日发表全会公报，承认在“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犯了严重错误，绝大多数在“镇压逃税”运动和“土改”中被捕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被平反和释放。越共总书记长征成为替罪羊，引咎辞职，由主席胡志明代理总书记。直接主持“土改”的政治局委员黎范龙被贬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胡越杭则被贬为普通党员。越南通讯社1959年10月29日的报道披露了越共在“土改”中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包括依靠坏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选择斗争对象，“大量贫农和雇农受到打击，许多中农受损害，富农几乎全被划为地主”。越共党报1956年11月1日的报道中也提到，“土改”中“很多地区用刑讯逼供，用伪造的文件将无辜党员干部和群众送进监狱”。不久黎笋从南方调到北方担任党的总书记。这一调动表明，北越党组织的错误已严重到要由向来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南方党组织来帮助纠正的地步。此后，在黎笋的领导下，越共开始逐步摆脱中共的影响。

“十中全会”之后，越共开展了针对“土改”和知识分子问题的“纠错”运动。河内电台10月30日广播说，“十中全会”后，党的首要任务是民主化和改善人民生活，而过

去一直列于首位的民族统一此时移到了第三位。越共还召开了“700人大会”，传达中央全会精神。会上由军事领导人武元甲作报告解释中央的新政策。武元甲被认为和中共关系不深，与洪水在学习中国经验上有矛盾，在领导“奠边府战役”中曾经不理睬中共的军事顾问，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比较开明温和。北越党选择他在这个时刻作报告显然是一种姿态。此外，越共主管文艺的素友和阮庭氏公开承认，犯了压制知识分子自由创作的错误，主持审查和逮捕陈寅的怀青发表文章说，他把陈寅定为“反革命”是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的。

当时的北越驻华大使黄文欢曾回国参加1956年9、10月的全会，并在会上被提拔进政治局。当他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专门召见他询问北越“土改”中的错误是否与中共顾问团有关。黄文欢回答说，中国经验都是好的，错误是越南人自己犯的。这很明显是政治套话。周恩来如此关心越共的“纠错”，显然是因为中共对北越党揭露出来的问题深感震动。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对北越1957年的“纠错”运动作有限的介绍。如周新城主编的《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一书，在肯定了“土改”中“贫困农民通过向地主阶级展开暴风骤雨般的斗争”分到土地的“成就”时也说：“到1956年夏季，越共发现土改中在镇压敌人、整顿组织、划阶级成分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即扩大了打击面，错划了一些人为地主、富农，把在革命战争时期以‘白皮红心’面目参加革命的人，错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开始纠偏，到1957年底结束。负责土改工作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引咎辞职。”这段文字对越共搬用中国模式造成的“错误”之后果介绍得极其有限，不但回避了中共对越南“土改”中“错误”的责任问题，而且对当时共产党国家中自由化运动和反斯大林主义的大背景促使越共“纠偏”这一点只字不提。

7.北越知识界自由化的高潮：《人文》、《佳品》运动

从1956年8月到11月，北越知识分子发起了“《人文》《佳品》”运动。这个运动主要以一批突然涌现出来的出版物为中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人文》和《佳品》。《人文》是一份公开的政治性周刊，其刊名意指“人文主义”，但也包含中国儒家在文学和哲

学的陶冶中修养人性之意。从1956年9月到11月，这份杂志只出版了5期，但刊登了大量尖锐的文章。《佳品》则是具政治倾向的文学刊物。除了这两份最重要的刊物外，还有《百花》、《新地》、《说真话》、《创造》、《新河内》、《新时代》、《祖国》等。这些刊物都是民办的，在报刊亭里出售，对官方报刊的销路造成强烈冲击。民办的明德出版社因出版《人文》和《新地》等刊物而令人瞩目。当政府机关通过压缩纸张的分配来限制其销路时，编辑部门号召读者捐款来解决问题。这些刊物或直接发起政治讨论，或用文艺作品的形式发表政见，其内容从党对文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到官僚体制，政府的腐败无能，有的甚至讨论“党国体制”是否具有合法性。

这些刊物发起的讨论引起了广泛反响，甚至扩展到河内人民代表大会和越南“祖国阵线”（越共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会议上。据Boudarel的研究，北越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的尖锐批判超过了当时的中国，更超过了苏联的知识分子。北越知识分子的目标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自由与民主，法制和人权，以及在思想和研究的所有领域开放言论自由。他们还借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的机会，对北越党在人民中灌输的对“胡伯伯”（胡志明）的带有家族长老温情色彩的个人崇拜提出挑战。

例如，《人文》主编潘魁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用伊索寓言的笔调影射胡志明是越南农家放置槟榔的石灰罐，这种石灰罐时间一长内部的石灰就越积越多，容积变得越来越狭长，直到无法使用，但却因使用年久而常被农家供奉起来。胡志明体型瘦长、年高，而且被崇拜，就象是这样一个老而无用的石灰罐。潘魁还说，不久前对陈寅的批判中，陈寅的一个罪名是在其作品中用了大写的“他”，长期以来，在北越这一人称代词只可以用来称呼“胡主席”。潘魁写道：“当我听到这个指控时，我觉得仿佛是在皇家宫廷里”。1956年10月，当北越自由化运动达到高潮时，潘魁正率领越南文化代表团在中国参加鲁迅逝世20周年的纪念活动。由于中共对鲁迅的推崇，鲁迅在北越也享有很高声誉。在北越自由化运动中，“鲁迅精神”成为异议知识分子向专制文化政策挑战的工具。在“《人文》、《佳品》”运动的高潮，选择这个运动的领袖人物前往中国去纪念追求知识分子人格独立和思

想自由的鲁迅，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而有可能是越共向知识分子作出的妥协。潘魁在《人文》上发表文章谈创作自由，举了一系列事例，包括一年前写纪念鲁迅文章时受到来自权力机构的蛮横干预。潘魁在文章中质问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创作？我怎么可能保持我的个性？”显然，当时在北越纪念鲁迅有实际政治内容，与当时知识分子与党的矛盾有关系，并和知识分子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人物有关联。

在“《人文》、《佳品》”运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来自中国的影响。中共的“双百”方针和1956年对知识分子的新政策鼓励了北越知识分子。越共理论家和领导人搬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录来论证越南历史也有那么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很多越南历史学家对此感到十分厌烦，毛的“百家争鸣”说法正好给他们提供了理论武器。越南著名的历史和人类学者陶维英说：“在有关越南历史和国家形成的辩论中，很多研究者不敢提出那些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领导人的意见的新观点。谁敢越雷池一步就会遭到离经叛道的指控，就只能闭嘴。在很多研究和讨论领域，很多人只有一个恐惧，那就是在无意中偏离了正统教条和官方思想规定的现成的路径。对于他们来说研究工作成了马戏团里需要高度技巧的走钢丝。”他大声疾呼：“我们必须采用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领域的政策：‘百家争鸣’！”这些刊物和参与讨论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在他们背后有中国的自由化在撑腰。Ninh指出：“事实上，《人文》对中国和东欧的发展亦步亦趋，在越南回应中国的百花运动和波匈的自由化……《人文》的作者们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更广泛的国际性运动的一部分。”此外，仅仅从一些刊物的名称(如《百花》、《新地》等)上也能看出中国的影子。

其实，在“《人文》、《佳品》”运动中，受到最严厉批判的恰恰是越共从中共那里移植或借鉴来的东西，而不是离越南实际较远的斯大林主义。这与赫鲁晓夫推动下出现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国家批判苏联模式如出一辙。从以上叙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通过“延安整风”建立起来的、以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的、经周扬等人贯彻推行的中共文艺路线之北越翻版在1955年到1956年就受到了挑战。北越知识分子提出，文艺要摆脱党的控制而独立，文艺家要有创作自由，他们和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陈寅在1955

年2月向党请愿时提出：“一个作家责任感的最高表现”是对真实的尊重和信念，它“超越一切指示和理论”；作家必须服从真实，不能为了政治需要而扭曲它。潘魁则用直白的语言说：“文学为政治服务，政治领导文学和艺术，这已经变得天经地义了。但我们必须要问：如果政治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能仅仅依靠口号、旗帜、传单和命令而没有文学和艺术吗？要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政治必须拍拍文艺的肩膀，说‘我和你联系是需要你，需要你的艺术’。只要政治这么说了，文艺就会同意。但被政治所需要的文艺的功能只是文艺的一个部分。政治（连这一部分也）不能领导，文学和艺术必须要求自己的自由。因此，我想政治没有理由不接受一个（政治和文艺）双赢的结果”。

越共从中国照搬的以“思想改造”为主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另一个在“《人文》、《佳品》”运动中被批判的重点。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深恶痛绝，他们敏感地认识到，在这种“改造”的背后其实就是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目的是把知识分子“搞臭”，这是毛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土改”中对“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的纵容出于同一根源。历史学家陶维安强调说，这种“改造”的实际结果是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甚至使他们耻于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著名律师阮孟墙说：“当发现党对他们完全不信任时，参加抵抗斗争的知识分子……感到痛苦和失望，尽管他们为党作出了无数牺牲。是他们索取过多吗？他们提出要当部长或者大使吗？没有。完全没有……他们的大多数只不过要求根据他们的才能服务于人民，捍卫他们的荣誉和思想自由，他们相信这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最本质的东西。”很多自由化运动的参加者还对蔑视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和才能的“外行领导内行”（这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统治的表现，对它的批判也是中国“右派”言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做法大张挞伐。有一首诗这样说：“喜欢说大话的领导人，虽然对文艺一窍不通，他却一直在说教和批评。鸚鵡学舌地背诵从书本上看到的他自己还没有弄懂的字句，他的心就像干木头，他的说教闻上去就像烧焦的米饭。当被问倒时，他拍着胸脯，挥舞着党的文件，一心只想把人吓倒”。

在“《人文》、《佳品》”运动中，异议刊物还大量揭露从1953年春到1956年的“土改”中对所谓“阶级敌人”滥施暴力、折磨和杀戮的情形。北越的知识分子指出，甚至在1956年9月越共已被迫承认“土改”中的错误、发起了“纠错”运动并大量“平反”和释放被捕者时，各地“土改”中的既得利益者和有血债者仍然利用他们在“土改”中获得的权力，以暴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对被“平反”和返乡者施加报复。例如，1957年3月14日出版的《新地》杂志详细报导了一个案例：一个村庄的前村长在“土改”中被划为恶霸地主而遭逮捕，但在“纠错”运动中被重新划定为中农成分并被释放。就在他返乡途中，曾把他定为“地主”的新村长却纠结手下人将他处死。

1956年11月5日的《人文》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在土改中，非法逮捕和关押、剥夺财产，对地主住宅的隔离(这造成了很多无辜儿童被活活饿死)，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领导有失误所能解释的，而是因为完全没有法制。”造成这种无法无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党的专制和暴力摧毁了农村的秩序，建立了以“土改”工作队为代表的绝对权力。一个参加过“土改”的知识分子发表文章说，他当时被派下去报导农民的苦难和地主的残忍，但他看到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他回忆道：自己所属的“土改工作队”队长进入一个村庄后没几天，就组织大会用枪毙一个“地主”来提高农民的“革命精神”，还要求工作队员通过与农民结婚来“提高思想觉悟”。这位知识分子表示：“我对这种行为表示怀疑，但我一声都不敢哼。他（队长）动一动指头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

越南哲学家陈德草尖锐地指出，在“土改”中，整个省和区一级的政权结构都被重新改造了，其目的是把“整个农民阶级痞子化”。根据“土改”的教训，陈德草强调，“自由的本质是个人自由”以及“自由的内容”必须由“自由的形式”来保障这个自由主义的原则。他的观点对共产党所主张的自由首先是集体的和社会的自由以及实质的自由重于形式的自由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他说：“自由的形式是个人自由……个人为共同体服务，但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个人之上，在人民的法律范围内存在的个人自由的形式使得个人能够为建设共同体作出贡献。”

在有关“土改”问题的讨论中，产生了对个人自由(权利)和法制的呼声，而实现它们的首要条件则是确保言论自由。《人文》杂志的最后两期曾为言论、集社和迁徙自由大声疾呼。当时河内还有很多殖民地时期或在法国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他们从法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总结了“土改”的教训，甚至追究政府的责任。阮孟墙是当时的一位著名律师，他在1956年10月对越南国民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土改”中的“过火”行为；对干部的工作建立制度性的监察；把非官方的群众组织真正建成表达人民意见的渠道；实现建立在出版和新闻自由之上的言论自由。他强调说，在越南，政治权威至高无上，凌驾于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上，这是导致“土改”中灾难性错误的主要原因。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长征和农业部长等党的领导人虽然承认了错误，但没有触及制度性的根源。他说，作为律师，在这样一个党政结构中，他无法判断什么样的个人能够为这样大的错误承担“责任”。

参加自由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就长期坚持民族独立立场的老知识分子；第二类是比较年轻的一代，他们的主要政治经历是参加“越盟”或越共领导的抗法斗争，包括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上文提到的陈德草、阮孟墙、陶维安和陈寅等人，就是这两类人的代表。此外，还有很多知识分子站了出来。邓范努是著名生物学家，他曾经在战争年代帮助越共就地取材制造抗生素，以克服森林生活中的种种传染病；女诗人刘氏燕(笔名翠安)是越南著名作家，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者，她在30年代编辑了两份很有影响的妇女杂志，出版过爱情小说《魂》；长友则是40年代初把心理学引进越南的学者，他一直支持“越盟”的抗法斗争，尽管他反对它的很多具体政策；在年轻人中，文高是青年作曲家，北越国歌的词作者和谱曲者；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值得一提的是阮友灯。他是越共政府青年部副部长，在越共政治活动中非常活跃。当胡志明1945年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著名的“越南独立宣言”时，他是广场上群众集会的发动和组织者，并以此成名。他也是陈寅1955年2月请愿的参加者和关键人物，后来一直利用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关系，推动着自由化，保护知识分子，与素友、怀青等文艺界的党棍发生过尖锐的

冲突；在一些被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封为“民主人士”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中，出版家陈少宝具有代表性。他主持的明德出版社出版了《人文》、《佳品》和《新地》等刊物，为异议分子提供了阵地。

四、中越两国当局知识分子政策的马鞍型同步演变

当“斯大林模式”在东欧受到公开批判时，以“土改”、“镇反”、“思想改造”（“整风”）和“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代表的毛主义模式，也在中国和北越受到挑战。当然，在严格意义上，毛主义的这些政策都可以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找到对应的内容，并非毛主义的独创。例如，列宁早就主张，文艺是党的一条战线；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也把大量农民划为富农并消灭。尽管如此，这一整套政策毕竟是毛主义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主要特色，而且系统地构成了毛主义的精华。在中共能够有效施加影响的北越，毛主义就是越共的精神武器。正因为如此，当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向斯大林主义发起全面挑战时，北越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由化浪潮直接指向毛主义，而非斯大林主义。需要指出的是，越南知识分子争取政治自由的努力与其中国同行的命运息息相关，而越、中两国当局应对这一挑战的举措也基本上同步同调，因此，1956年到1957年间中、越两国当局的知识分子政策呈现出有趣的马鞍型同步演变。

1.北越镇压义安省的农民暴动却允许知识分子继续“鸣放”

就在北越知识分子向党挑战的同时，1956年11月，北越农民向“土改”和党在农村的组织发起了暴力反抗。这次农民暴动发生在胡志明的老家义安省，1930年到1931年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义安一河静”暴动造就了越南的“苏维埃”运动。然而恰恰就在这个“群众基础”较好的“老区”，越共推行的“土改”政策令农民积怨甚深。1956年10月底，越共中央全会承认，在“土改”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个消息传到农村后，农民并未因

为党认错了而感恩戴德；相反，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在11月5日发起了武装暴动，大约有2万多农民参加。越共被迫调动其军队中的精锐第325师，一个星期后才将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大约有6千农民被杀或被强迫迁移。当时，北越义安省农民对政府的反抗，在规模上或许仅次于“匈牙利事件”，但今天很多研究者对此知之甚少。

毫无疑问，这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威胁到北越政权的基础，本来应该增加越共的恐惧，使它任何异议更加敏感和不宽容，何况这次农民武装暴动正好与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同时发生。如果北越政权把这次农民暴动和城市的知识分子抗议相联系，在镇压农民之后强化对城市知识分子的镇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让人意外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匈牙利革命和北越本国农民的暴动被镇压之后，北越党不但放松了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而且还允许他们继续“鸣放”。单从北越的国情出发，人们很难相信北越共产党1957年缓和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完全是出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当时正是中共置苏联和东欧对“百花齐放”政策的批评和抵制于不顾，号召知识分子在单位里和报刊上广泛向党提意见的时候。考虑到中共和越共之间联系的紧密，北越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宽松政策或许很难说是偶然的。

2. 当时越共对中共的政治依从

当时越共在国内政策上对中共意见的重视，可以从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中找到充分证据。至今中国当局对历史上中共和越共之间的政治关系(此处指中共如何影响北越的内政，而不是指军事、经济和南北统一问题)透露甚少，但还有线索可循。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说：“日内瓦会议闭幕前夕，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要求中国对越南巩固和平、扩大土改、接管城市、恢复和发展经济等工作进一步提出意见，并派人协助。”显然，中共自己也承认，它参与了北越“土改”的决策和实行，所以北越“土改”中的“扩大化”无疑与照搬中共模式有关。

北越镇压农民暴动的枪声未息，越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共就下列问题提供意见：“一，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意见；二，为实现日内瓦协议而斗争的工作任务；三，越南目

前的财政经济状况与今后经济工作的任务。”其中第一项“目前局势”的含义非常广泛，当时共产党国家面临的“局势”中最重要的是“非斯大林化”和镇压匈牙利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而越南国内最重要的“局势”当然就是农民暴动和知识分子的抗议。

1956年11月18日到21日，周恩来访问了河内，对北越党表示支持。中共前高级外交官李连庆介绍了周恩来在北越的活动：周“针对越共提出的问题，谈了目前国际形势，兄弟国家的关系，中越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党近几年所办的几件大事和中国从这些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特别强调了中国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纠正错误的长期性”。在与越共政治局会谈关于越南国内的情况时，周恩来说：“北方是人民民主的基地，必须大力巩固北方，才能争取南方，统一越南”。周恩来还说：“土地改革的成绩要肯定，有错误是难免的，纠偏不能抛弃正确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使自己处于被动，使群众失去信心。”周与北越领导人会谈时显然涉及到北越“土改”的严重后果，他谈到中共近年来的“几件大事”和“经验教训”中，可能包括在苏联和东欧被拒的、但在北越却推动了知识分子异议运动的“双百”方针和对知识分子的宽容政策。

1957年4月，中共突然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与此同步，北越当局也放松了控制，允许异议运动再次活跃起来。

3.北越当局 1956年到 1957年对自由化运动之对策的起起落落

北越的自由化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过程：第一个时期从1956年8月到11月，随着匈牙利革命被镇压而中断；第二个时期从1957年春到夏秋之交，在北京维持“双百”方针的背景下，北越知识分子被允许重新“鸣放”；随着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北越共产党也彻底剿灭了自由化运动。

从1956年8月到11月，北越的自由化运动经历了“《人文》、《佳品》”时期。从11月初开始，紧接着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越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击知识分子的文

章，特别是一些催促政府采取行动的所谓“群众来信”。越共《人民报》在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后第五天发表社论说：“我们不应允许任何人利用民主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离间党和人民，诽谤我们的制度，在人民之间制造混乱，或者散布有害的、反动的思想。”经过约一个月的宣传，12月18日，根据北越政府主席令，河内市政府停止了《人文》和《佳品》的出版，关闭了出版这两份杂志的明德出版社，没收了市面上的这些杂志，还要求过去购买这些杂志的人将它们交出。这无疑是“《人文》、《佳品》”运动的重大挫折。当时国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就像在东欧一样，北越的自由化就此告终。英国《经济学家》特约记者在1957年1月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中国的阴影下：胡志明的方式”的文章。该作者认为，《人文》、《佳品》是越共在“非斯大林化”的气氛中和中共的鼓励下放出的试探性气球，看看知识分子想走多远，党能容忍多久。“现在看来，无论如何这个实验是结束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1956年11月到12月河内的政治风暴并未持续多久。两个月后的1957年初，《人民报》的反自由化运动就失去了势头，虽然不时地仍有批判文章发表，但不再象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所有在前两个月中受批判或牵连的知识分子都安然过关，除了个别人调动工作外，没有一个人被逮捕或开除公职，很多人只是作了自我批评。Ninh指出：这些知识分子“继续保留党和政府内的职位，在某些人那里甚至是领导职位，例如在出版社和文联执行委员会中”。如陈寅和黄琴仍然在文联下属的出版社工作。1957年2月，北越全国文联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竟然出乎意料地没有提到“《人文》、《佳品》”事件，只是说要和“错误倾向作斗争”。就连被认为是党在文艺界代言人的诗人素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也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文化和艺术活动中，我们可以也应该有在共同基础上的不同的倾向，因为这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所有观点和艺术倾向都可以而且应该从讨论中表现出来”。

1957年5月，北越文联出版了一份新的周刊《文学》(Van)，作为新成立的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在这份刊物的旗帜下，那些《人文》和《佳品》的作者很快就聚集起来，重

新发表对文联领导机构甚至党和政府挑战的文章，“那些在前一阶段对他们的批判看来丝毫没有起作用”。因此，1957年上半年北越的文化气氛和1956年底明显不同，越共不但没有强化批判运动，惩罚那些在1956年夏秋向党挑战的知识分子，反而允许自由化的倾向恢复和发展。《文学》虽然时不时地受到《人民报》的质疑和批判，但当局没有形成一个有声势的运动或迫使异议作者沉默。Hirohide Kurohara 在他关于北越1957年文化政策的研究中认为，当时北越党有两条“灵活”的路线：“一条是尊重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强迫他们从事政治学习或体力劳动”，而在50年代上半期则是必须人人过关的；另一条是“在贯彻党的政策时采用温和的方法，力图通过说服和耐心讨论和知识分子达成共识”，在贯彻这一路线时，“那些执行政策的党的干部受到警告，要他们不得粗暴行事。”这个被恢复的自由化运动持续了大半年。

1957年7月8日，越共领袖胡志明途经北京前往北朝鲜、苏联和东欧，此刻正是中共全面展开“反击右派进攻”的时候。8月底，胡途经北京回国。两次路经北京时，胡都与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胡志明公开的政治日程表上，他与中共领导人谈的只是越南南、北方为和平统一举行自由普选的问题，但人们很难想象，中共领导人会对从“双百方针”到“反击右派”的转变及其中之谋略不作任何说明。胡志明的中文非常好，他在中国期间，只要翻开中共的报纸，“反右”运动就会有声有色地在他面前展开，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很可能会让他心有所悟。

1957年7月和8月中共刚发动“反右”，越共理论刊物《学习》便开始发表文章，发动对《文学》的批判，声称它的内容“极大地偏离了现实，偏离了生活、偏离了革命的责任”，为“资本主义文学的观点”提供了讲台。待胡志明回到河内，北越的政治气氛立刻为之大变，北越党开始部署全面反扑，完成在1957年初没有充分展开的政治运动。9月16日，胡志明回国两周后，他在北越《人民报》上用化名“陈力”发表文章（毛泽东也曾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在“反右”运动开始时发表过“这是为什么？”），标题是“粉碎右

派”。胡志明用典型的毛式语言说：“右派是毒草。让我们把他们连根拔除，化作肥料，改善我们稻田的土质。”

国际学术界一些研究50年代北越文化政策的学者，也从共产党国家政治形势的整体演变角度，指出中共对北越转向“反右”的影响。比如Kurihara认为：“苏共的二十大和反斯大林曾经促成了《人文》和《佳品》，中国的百花齐放也起了相同的作用”；但到了1957年夏，他们都改变了政策，特别是“中国的‘百花’运动已经变成了反右运动”。

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和批判，1958年1月6日，越南劳动党中央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文学问题的决定”，要求把那些“颠覆分子”从文学组织中清除出去，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教育”。于是，《文学》周刊被取消。接踵而至的是一场持久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当局企图一劳永逸地清除北越知识分子中的异议人士和异议思想。越共没有正式使用“右派”之类的政治整肃范畴，而是用“反革命”、“反党”、“右倾错误”等罪名整人。1958年2月，首批172名参加了“《人文》、《佳品》”运动的知识分子被送进“再教育班”；3月又有第二批304名知识分子被送去。这些人中大约300人是作家和艺术家，其他人则是教育、文化和出版机构的人士或干部。与中共一样，越共让那些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陈德草、阮孟墙、陶维安、陈寅、黄琴等)在报纸上发表自我批判的文章，名义上是清除散布的“毒素”，实际是对那些“小”右派们显示党的威力，起震慑作用。

《文学》被停刊后，新出版的《文学研究》由党的文艺“理论家”阮廷氏主编，1958年5月出版的第1期就刊登了大量“自由化”分子自我批判。

越共对这些“自由派”分子的处理，也仿照中共根据“右”的程度不同而“区别对待”的做法。例如，上文提到的阮友灯、刘氏燕和陈少宝这三位被正式逮捕；其他人有的被开除出文联(如潘魁)，有的人文联会员资格被停止三年(如陈寅)，有的被撤销行政职务(如诗人黄琴的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被撤销)。1960年越共当局安排了所谓阮友灯、刘氏燕和陈少宝等人“特务案”的审判，在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们是“法国间谍”，分别判处5年到15年的徒刑。北越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潘魁被下放劳动，就在当局

准备给他安一个罪名加以审判时去世，他在“祖国阵线”机关报担任编辑的儿子不久也去世，死因不明。一个为越南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奋斗了三代人的家庭就此悲剧性地告终。

除了集中打击“自由化”的带头人物，越共也全面整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1958年夏，越共发动了大规模的“下乡进厂”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在“《人文》、《佳品》”时期的“政治表现”如何，都必须去农村和工厂，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同时接受“思想改造”。近年在中国大陆对北越的“反右”运动也有一些有限的介绍，有一本书提到：“1957年，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在《人文》和《佳品》杂志上发表‘毒草’作品的人展开批判，把这批人定为‘人文佳品’集团分子，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有的被开除公职、软禁，有的被劳动改造，有的被投入监狱，境况都很悲惨。越南实行革新（即改革开放，本文作者注）之后，打成‘人文佳品’集团分子中的某些人的作品又重新发表，但和中共承认反右扩大化和为多数右派平反不同，无论对他们本人还是对整个运动，越共都一直维持当初的结论，没有任何平反决定。”

结 论

从1956年到1957年共产党阵营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自由化运动，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考察。共产党阵营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世界，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中心—边缘”的政治结构。作为共产党体制的主要模式，斯大林主义当时固然最有影响，但这并不排除毛主义作为另一种模式的存在和影响。对于研究毛泽东和中共革命的人来说，有必要认识到，毛主义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破产前20年，就在中国和越南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否定。换言之，共产党统治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对毛主义的批判，自19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是那场自由化运动的主流，也由于中国官方对历史记忆的压制、抹杀和对历史真相有选择的披露，才使得那段历史的这个侧面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了解。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当时的内容，既包括“土改”、“镇反”、“思想改造”和对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的控制，也包括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一些新政策，如“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的暂时调整和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两方面的政策彼此密切关联，它们代表了50年代中期国际共运发生巨大变化、苏共的老大党地位动摇时，毛泽东和中共在一党专政体制内寻求一种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尝试——当然在这种尝试背后也有毛企图充当共产党阵营“龙头老大”的雄心。这些政策在东欧和北越的知识分子中得到强烈共鸣，促进了自由化的发展。“匈牙利事件”后，中共不顾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当局的反对，不但坚持“双百”方针，提出“在人民内部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还继续鼓励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无论毛当时是否决定“引蛇出洞”，这些政策在客观上延续了“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这在北越的案例中尤其明显。但最终这种对“自由化”的有意操控导致的是更悲剧化的结果：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和政策转变后对知识分子的整治手段是极其阴险和彻底的。如果说在东欧国家，异议运动在匈牙利革命后遭到了压制，那么，在中国“反右”运动是力图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异议运动在社会各阶层中连根拔除。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次国际性危机并非结束于匈牙利革命的被镇压，而是中共的“反右”以及它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

从研究中共党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反右”前采取的宽松的国内政策，不单纯是为了“引蛇出洞”，还有在国际共运舞台上沽名钓誉的策略性目的。中共运用国内政策为提升和巩固其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服务，始于波匈事件，终于“文革”。可以说，国内政策大幅度变动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相互配合，这既是毛泽东生前最后20年执政史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3期。本刊删掉了原文的注释。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本期校对：韦陀 任富田

封面设计：贺真